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1)	解放初期在河套及三公旗剿匪纪实孝顺嘎撰写 仁钦翻译 董玉奇整理
(22)	安北县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及王副县长遇害的简要经过董玉奇
(51)	回忆我在西公旗等地当户家军 日伪警察——国民党军——最后投诚解放军的坎坷经历贺太保忆述 仁钦翻译 罗布森 那木吉拉 张世杰整理
(86)	日寇侵入河套及五原战役安春山 宋海潮
(114)	五原战役片断回忆刘会有
(123)	日寇飞机轰炸五原王兴亚

(127)	解放前陕坝的商业概况孟传志
(140)	我在“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的 十年韩葆忆述 哈日夫翻译 罗布森 那木吉拉 王伟强整理
(155)	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刘玉仁 吴玉山口述 董炎炳整理
(163)	旧社会河套的“独立队”和“哥老 会”之概述刘培荣
(176)	哥老会及其暗语王致忠 王天林 张彦彪口述 樊登高整理
(183)	陕坝明妓院及暗娼简介高炳炎
(187)	旧社会的“禁烟”、“禁毒”王恩荫
	封面：阴山岩画 (说明见第一辑)

解放初期河套及三公旗剿匪纪实

孝顺嘎撰写 仁钦翻译

董玉奇整理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原绥远省和平起义以后，有些原来就流窜在民间的匪徒和起义以后受骗哗变的部队，拒不接受整编改造。他们流窜在河套和原三公旗一带，兴风作浪，骚扰人民；还有国民党极少数特务分子，隐蔽起来蛊惑人心，继续搞破坏活动。对这股匪特逆流，若不戮力解决，社会不得安宁，新政策无以实现。当时我蒙骑四师在政委毕力格巴特尔同志率领下，在与友军的配合以及当地党政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跋山涉水，冲锋陷阵，穷追猛击，奋力征战，终于把杨××、张疤子、苏德拿木、以及巴图等匪特分子，予以消灭殆尽。为以后所开展的土改、三反等运动奠定了基础。现就我亲身经历和记忆所及的事实，分述如下：

一、解放初期河套匪特猖獗

五〇年六月，我蒙骑第四师奉原绥远省军区指示，为了保证生产、建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围歼国民党武装残匪及暗藏的特务分子，以便于在农区开展土改，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运动，由师政委毕力格巴特尔同志，亲率两个团开入河套地区。

当时河套地区的情况是：“九·一九”起义以后，各县都派了党的代表和干部，行政区党的工作由沈新发同志主持。当时，从河北、山西也派来了不少干部。与此同时，刘参谋长亲自指挥的察哈尔、河北军区第七分区直属白马连，也驻防陕坝。由于匪众我寡，不能给敌人以狠狠地打击，于是又派来董其武起义部队的赵团长，率领第二十七团前来配合剿匪。但仍然与事无补。其原因是：解放未久，在旧部队内以及乌拉特中公旗、西公旗、东公旗原有的近二千名各旗属部队，虽然举行了起义，接受了我师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的领导和协助，实行了民主改革，但仍有一些人叛变，不断地去投奔匪徒。尤其是乌拉特西公旗郝游龙，直

接与蒋介石联系，自封为国民党《救国军》司令。他的部下卢万惠团长，带一个团当土匪去了。还有乌拉特中公旗的部队头子乌兰，也暗地里与敌人勾结，不再接受民主改革。因而当时的河套地区匪情猖獗，形势复杂。

二、击毙杨×× 活捉张疤子

在我剿匪部队进入河套地区的第二天，就投入了战斗。我们在乌兰道布的农区，包围了以杨××为首的百余名《救国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打死三十余名，俘虏八十多名，将该匪全部歼灭。唯独杨××逃窜到黄河岸边躲避以求苟生。当地农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我们报告。我部连长德宝同志带领几名战士，立即出击。当时本欲把他活捉回来再行处理，不料他竟敢负隅顽抗，并还打死我军一匹军马，结果被我军把他就地击毙。

我军入套后，首战告捷。农牧民目睹了这场战斗，欢欣鼓舞地伸出大拇指说：“人民解放军真是好样的！为民除害，好得很啊！”

“共产党拨开乌云，咱们百姓重见太阳的日子来到了！”乡亲们个个乐得笑逐颜开，奔走相

告，自动杀猪宰羊，纷纷来慰劳我们。

自从我军进驻河套，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以后，他们在黄河两岸无法站脚，在套内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于是，纷纷窜到太阳庙以东，连绵起伏的深山峡谷里，或者逃到山后山岱庙附近潜伏起来，伺机活动。根据这一情况，我军决定：兵分前山后山两路，从南北两面夹击，以求全歼敌人。于是部队立即出发行动。师政治部主任乌力吉那仁同志，亲自带领两个连，又增派两个排，住在巴音山岱庙侦探敌情，截击敌人。

一九五〇年阴历七月十六日，我军对以张疤子和阿拉坦朝鲁为首的一百六十多名匪徒，穷追猛击。从哈尔鸩鸩庙、敖古勒吉庙附近，追赶到山前太阳庙以东小庙一带，遭到我山前部队迎头痛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这一仗除消灭了四十多名喽罗、俘虏了阿拉坦朝鲁之子金风（蒙名毛希拉）之外，还活捉了人民所痛恨的张疤子。

三、乘胜追歼苏德拿木匪部

以西乌珠穆沁旗叛徒苏德拿木为首的一百

二十多名匪徒，当日向哈尔嘎那图口北上，逃到山后。这时我军追击的战士，疲惫不堪，亟需休息，于是，领导开会决定：让追击敌人的战士、马匹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新的战斗；令山后二连三个排战士，全部改乘骆驼，携带干粮，昼夜兼程，追击敌人，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根据这一决定，我军向乌拉特中公旗西部达木勒（苏木长）孟和，提出暂借用一百二十峰骆驼的要求，孟和立即应允照办，并在六个小时以内就如数集结完毕。

农历七月二十日夜間，战士们骑在披挂了马鞍鞢的骆驼上，从巴音山岱庙出发，一面探听消息，一面追击匪徒。于二十一日破晓时，在水草丰美的萨拉古尔洪古尔的地方，巧遇上那一百二十多名土匪。于是，立即展开激烈战斗。在我军英勇冲杀下，敌人无处藏身，只好从巴图高地南下，且战且退。我军沿着太阳山南麓猛追猛打，把敌人赶到阿贵庙东侧苏木河，沿河槽北上。在追击敌人中，虽然骆驼一时赶不上马匹，但它却具有惊人的耐久跋涉力，是有利的条件。当我军向敌人马蹄扬起尘土的方向

跟踪追击到苏木图河中段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喇嘛迎面跑来说：“匪徒们刚才抢走我七峰骆驼，还问我：‘哪里水草好？’我回答说：‘敖克以东查干乌苏沙漠里有块丰美的水草地，也许他们今晚在那里过夜。”当我们了解到匪徒的去向和估计到当晚宿营地点，再加这位喇嘛急于想要回被抢去的骆驼的迫切心情，经征求他的意见非常愿意给我们带路时，大家不顾疲劳乘胜追击，于是在这位喇嘛的引导下，向敌人追去。

日落之前，正好赶到乌苏沙漠绿洲边缘。匪徒们愚蠢得很，他们以为逃到那里太平无事了，便把马放到南山上，任它们成群结伙地大吃大嚼。人员忙着做饭吃喝，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来得如此神速迅猛。战斗开始以后，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象晴天霹雳、惊天动地。从未闻过枪弹声的骆驼，受到惊吓，便伏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战士们急中生智，丢开骆驼，抢骑上敌人未备鞍鞴的马匹，东打西杀，飞奔战斗。经过三十多分钟的激战，除有二十余名敌人仓惶先夺马而逃外，其余绝大部分被

歼。计俘虏六十六人，击毙二十八人，缴获步枪七十八支，弹药一万余发，轻机枪两挺，手枪十一支，战马九十二匹，骆驼二十三峰，还有匪徒们向农牧民抢来的衣物、皮张、绒毛、以及锅、碗、瓢、勺等等应有尽有。当这位向导喇嘛，如愿以偿地往回赶着他的七峰骆驼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接着我军战士押着俘虏，携带上战利品，连夜返回巴音山岱庙休息。翌日早晨，我带一个班战士，重返原战场，核实敌人死尸，收拾丢失物品，打扫了战场。

根据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夜侦察的敌情是：匪徒化整为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地钻进深山峡谷里去了。于是我们一边研究歼敌措施，一面归还借来的骆驼。

七月二十四日傍晚，突然有位放羊的人骑着骆驼，从距巴音山岱庙不远的莫尔格策格，赶来报告说：“刚才我赶羊回牧时，见三十余人，从塔奔铁黑勒直奔我家方向去，远望他们到马桩跟前，那种蛮横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是土匪，我把羊群丢在野外跑来报告”。首长们让这位牧民稍等一会，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命我带本连一个班，再加上中公旗特黑斯尔古楞四十余名战士，迅速赶到莫尔格策格一带，从敌人后方包围上去，届时必须连发三个信号弹，作为联系；团参谋长朝鲁同志亲自带领两个连战士同时出发，直奔巴音温都尔山，截击敌人的去路。于是我和战士们连晚饭也顾不得吃，跨上战马，由这位报信的牧民带路，急速赶到莫尔格策格。据了解果然有匪徒三十余人，由西乌珠穆沁旗叛徒苏德拿木带领，朝达尔罕策其勒格方向去了。在我们跟踪追击下，匪徒们穿过巴音都尔山南麓，拐往东北方向，路经德吉德素大妈家，喝了酸奶子后，又向东逃窜。

为了继续追击敌人，我们找到了一个喇嘛向导宁如布扎木苏，正在准备动身的时候，参谋长朝鲁同志带两个连战士赶来了。这时我们的一个班和这位向导，一起由参谋长率领去追击敌人，我所带的旗属部队，有一半兵马已经精疲力竭，只好全部留在这里休息。谁想在穿越茂密的芨芨滩时，向导宁如布扎木苏迷了路，辨不清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时机，一直

到早晨，才摆脱了迷茫无际的莫荒滩。远方的景物清晰可辨，发现匪徒们果然是露宿于海力素以东的查干德尔素山梁上。这时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时刻惴惴不安地警惕着我们。当 they 从老远处看见我军时，便爬上马，胆怯地向东逃命。我军扬鞭策马，以最快的速度向敌人追去。但敌我之间还有二十余里的距离，开枪射击显然无济于事，只能快马加鞭别无他法。当时指战员们的决心是：任凭他们插翅飞上云霄，变成老鼠钻进地缝里，也要把他们歼灭干净。

乌拉特中公旗的牧民，有个传统的习惯，在七八月时节，绝大多数蒙古包外部拴着吊膘的骑乘马。就在敌人的骑马疲乏不堪时，他们抢先换乘了蒙古包外的马子，继续飞跑。而我军仍骑着跑得汗水淋漓的乏马，相比之下要追上敌人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我军指战员们仍然斗志昂扬，策马急追敌人。

我军参谋长朝鲁带领的部队，把苏德拿木为首的三十余名土匪，由汗选尔素追到向东的乌力吉图，路经公乃巴音钦得麻呢公“庙”时，（即乌拉特中旗的第二区）遇到当

地民兵，当即把土匪中的僧格、李托甲二人缴了械。其余的经艾青公向东逃窜到乌尼格图乌兰地区，与中旗民兵遭遇战后，又逃到达茂旗，终于把苏德拿木等匪首活捉了。剩下的二十个土匪，在昂根山夏日丑鲁地方，由中旗二区区长孟克围打，活捉了二人，其余的匪徒，路经哈尔达娃山，到了套内王义满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全部干净的消灭了。

四、彻底消灭分散匪徒，开展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

其后，我军为了适应当时形势，便于打击歼灭敌人，把分驻两地的司令部和政治处，迁驻在米仓县所在地三道桥。当我军进县城时，人民群众早已站满了街道两旁，热烈地欢迎我们，其气氛比过年还热闹。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载歌载舞，热情洋溢。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绿标语，到处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馒头，满缸满罐的烧酒。男女学生穿着节日的盛装，在欢迎队伍前头，不停地振臂高呼着：“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国民党武装残匪！”……当天晚上刘惠之副县长和党政负责同志，

举行了晚宴，款待了我师首长们。我陪同师政治委员半力格巴特尔，出席了欢迎宴会。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深情厚意，大大地鞭策鼓励着我们乘胜征剿匪特的决心。

师首长根据当地复杂情况，派出比连建制较小的武装工作组，在继续消灭分散匪徒的同时，开展镇压一切反革命运动。师首长指示我和参谋老力格扎布同志，带朝格吉勒扎布连长一个连，以拉僧庙和沙勒德布庙为重点开展工作。

拉僧庙是河套地区最大的庙宇，庙内喇嘛也最多。经过我们细致地调查研究，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还连续召开了各界群众大会，反复耐心地宣传讲解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此同时，广泛深入地发动庙内喇嘛，以及周围牧民中靠近我们的基本群众、积极分子，大胆地检举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发现了该庙从东部地区逃来后，改名换姓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有：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的仁钦道尔吉（汉名董一龙），还有浩特老团长以下的二十一名军官。这些人当中，有的任过反动军队连级到团级军官，有些人是日本特务，也

有些人是国民党特务。我们仅从拉僧庙就依法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十七个反革命分子。

在这些被捕人中，我们出乎意料地逮住个双料特务吉木彦。他原是察哈尔盟多伦淖尔县，希拉庙傅义的儿子，是日本驻多伦淖尔特务机关的特务。日本投降后，他又充当国民党特务，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一九四八年多伦淖尔解放时被我逮住，在押送盟公安局的途中，他又侥幸潜逃，从此以后下落不明，想不到这个家伙，逃跑到几千里以外的河套地区，仍然从事特务活动。他在国民党武装残匪无法在河套地区活动的时候，把武器藏在井里，伪装起来，还在原晏江县两狼湾一个牧户家，骗取了老妈妈的信任，作了她的女婿。我们查明情况后，立即把他逮捕，捆绑在嘎拉曾喇嘛的凉房里。遗憾的是这家伙趁夜里无人，又解开捆绳破门而出，企图逃跑，还要夺岗哨武器。幸亏岗哨上是我连有多次战斗经验的班长旺楚克同志，当机立断，一枪将他击毙。

五、揭露了巴图的真面目

经过调查了解，在沙勒德布庙附近，住着

一个叫巴图的伪军连长。他原来是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残酷剥削牧民的百户长。他来到沙勒德布庙后，把每年庙仓地租吞为已有，闹得下层贫穷喇嘛无法生活下去，并且暗藏枪支，窝藏特务贺氏。我们虽然查清并掌握了这些罪恶事实，但不能直接逮捕法办，因为他是当地民族上层人物，而且又是属于起义投诚人员之一。希望他能协助我们做些工作，因而采取了稳妥而和缓的方针，把巴图找来，向他交待政策，说明只要他能自愿交出窝藏在家中的国民党特务和枪支弹药，可以既往不咎，给以出路。开始他不但不肯交待，反而百般抵赖。最后在铁证下，只承认有五十支长短枪，表示要全部交出，唯独不承认窝藏国民党特务贺氏，并说：“他早在‘九·一九’起义前，就带着电台离开了此地”。为了尽快从巴图手中把枪支弹药悉数缴回来，我们决定对贺氏特务问题暂且不谈，派朝格吉勒扎布连长带一排战士，先把他暗藏的五十支长短枪，五千发子弹，全部收缴回来。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巴图父子俩，竟拿了两杆三八式步枪上了山，继

续为恶，并还捎来话通知了我们。

巍巍阴山，连绵起伏，山峦下碧绿的泉水，象一条银带，沿着弯曲的河道潺潺流过。山里到处都有岩石洞，据这里的人们传说，从西边最高太阳山至两狼山以东的策力庙山前德门为止，东西几十公里以内就有“三十八个仙人洞，八十二个普通洞”。巴图他们藏在哪儿？用什么办法抓住他们呢？我们分析研究以后认为：还是通过其家属做工作为宜。于是由我带乌力吉排长一个战士，到川井口巴图家中，向其家属子女，讲清了他继续走与人民为敌道路的危害性，我说：“我们举世闻名的人民解放军，有智慧有力量，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难道连两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吗？不是的，我们考虑到巴图父子二人的生命安全，只要他下山来放下武器，就既往不咎”。我们还嘱咐他的家属，照顾好他父子俩，按时给送茶饭。从此以后，再没过问和干涉他们与巴图之间的来往活动。

这时，我们向师首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师部指示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那怕是有—

线希望，也不要采取流血的办法，应千方百计地采取其它措施，加以解决。如果一定要采用武力解决的办法，那么务必先报告，等待指示。”这是因为，当年乌拉特中公旗韩葆等大巴音户，跟巴图有着最深厚的个人交情，在国民党时期，巴图曾帮过巴图毕力格、韩葆等人的大忙。根据师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们直接派人和巴图毕力格、韩葆开诚布公的谈明问题，让他们帮忙作巴图的工作呢？还是借用他们二人的名义写信给巴图呢？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假如巴图毕力格、韩葆二人不按我们的意图办事，势必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因此，还是先暂借他们二人的名义，写信说服巴图为好。于是，我亲自动手代替韩葆、巴图毕力格二人给巴图写了封信，大意是：只要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真诚投降，无论现在或将来，对你本人及子孙后代都有好处。保证生命绝对安全。随信还附了一条“哈达”（礼巾）。与此同时，从我军挑选了一位口齿流利，表达能力强的道尔吉同志，特意打扮成从巴图毕力格那里来的牧民“使者”，然后随同巴图

的家属，一起上了山去找见巴图。当巴图见了“使者”，看过了热情洋溢的信和“哈达”以后，便同“使者”互相问候，寒暄了一阵儿，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他思量了半天，擦干了眼泪便说：“我已经走错了路，现在放下武器投降吧！”说罢，就跟着道尔吉同志下山来。

我们热情的欢迎他回来，还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吃饭，席间我对他说：“你走错了路，现在放下武器来投降，这是好事，是明智的行动，不过，你要同这里的群众见见面，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今天，准备在沙勒德布庙召开群众大会，你要有准备罗！”

由于我们不让巴图自由活动，有五十多个蒙汉族人民拥来，七嘴八舌地说：“巴图连长有恩于百姓，是忠诚老实的好人，我们大家来是为了保他出去的”。他们嚷嚷闹闹纠缠不休，这些“保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跟巴图有刻骨仇恨的人，只不过是受坏人的蒙蔽和煽动而来的。所以对这些人，一时讲不清道理，我们没有也没必要直接劝说他们，而是让大家明

天再来，每户都要有人来，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巴图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如果是好人应该放他，我们就按大家的意见办。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当天，我们分头深入到附近基本群众中和各界人士家里去，进行广泛的家访工作，与此同时，还找来庙仓里贫穷喇嘛座谈，搜集有关巴图的罪恶材料。进一步揭露与掌握了巴图勾结国民党特务和携带武器上山，继续与人民为敌等反革命罪恶活动，为群众大会做准备。首先找来沙勒德布庙上年高有威望的格布黑喇嘛罗布桑扎木苏，我说：“去年秋季，我跟踪一个叫贺氏的国民党特务，从博力黑庙追赶到你们沙勒德布庙，便无踪无影了，那个特务拿着长枪，骑着一匹高头黑马，我可以断言，你们庙上准有人把他藏起来了”。格布黑喇嘛罗布桑扎木苏连忙否认说：“没有这事”，“不知道”，企图进行抵赖。可是，从他惶恐神态看，他是心虚的。这时，我有意地把话题转到巴图身上：“大家知道，巴图原是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百户长，他平时以什么态度对待贫民百姓和下层喇

嘛的？这个问题您该如实反映给我们吧！”罗布桑扎木苏喇嘛遮遮掩掩，避实就虚起来，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知道不揭发，将来是要负包庇责任的。”罗布桑扎木苏喇嘛意识到不好回避了，便如实地说：“巴图是个非常残暴、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如何剥削俗民百姓，我不清楚，但仅以庙仓地租收入为例，近十年间，他每年从中独吞五十石谷物，闹得众喇嘛一贫如洗。还有那个特务问题确有其事。当时，我和喇嘛道尔吉二人共同作弊，把他窝藏在庙里，没让你们逮去，后来把他送到巴图连长家里去了。那个特务送给管家喇嘛道尔吉一杆大枪，六十块大洋，百余珠珊瑚。给了我一匹金鞍马和一条地毯马褥子。这些东西我都存的好好的，现在叫来管家喇嘛道尔吉问一问，便可以证实我的话是真实的”。对他的这番交代，我们表示满意，鼓励他多向我们反映真实情况。

接着，又找来管家喇嘛道尔吉。他见到我们后非常害怕，神色异常，预感到问题已经暴露，情况不妙，经我们心平气和地向他交待了党的“坦白从宽”政策以后，道尔吉喇嘛咚的

一声双膝跪地，嚎啕大哭，他从把贺氏特务藏在佛龕，把那匹高头大马锁在诵经庙，以及接受特务送的枪支礼物等等，一五一十作了交代，并请求给予处理。这时我们因势利导说：

“你不仅充当了巴图的走狗，而且在他们的纵容下干了许多坏事，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不敢于面对事实，当面大胆揭发问题，是否有胆量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管家喇嘛不但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在群众面前控诉巴图，而且提供了个新情况，他说：“在二月间，巴图在家里纠集二十多人，全部武装起来，企图反叛上山当土匪，走出川井口以后，由于道尔金、却拉克等半数以上的人不愿继续给他卖命，上山为匪，因此只好收回武器弹药，各自逃命去了。”

在我们调查掌握了巴图许多罪恶材料以后，按原计划召开了群众大会，究竟巴图是好人坏人，该如何处置，让群众讨论定夺。起初，有些受蒙蔽的人，为巴图歌功颂德，企图保释巴图恢复自由。就在这时，格布黑喇嘛、罗布桑扎木苏站起来，怒视着巴图，一五一十

地揭发控诉，接着管家喇嘛道尔吉也学着格布黑喇嘛的样子，狠狠地当面检举了巴图。这时，道尔金、却拉克二人也有根有据地揭发控诉他威胁二十多人，全部武装起来，阴谋造反等罪恶活动。接着，我以大会主持者的身份，向与会者们征求意见：“巴图究竟是什么人，现在已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那么，应该如何惩治他呢？”群众愤怒了，纷纷高喊道：“他是个历史反革命，又是个现行反革命！”“坚决镇压巴图！”怒吼声此起彼伏，震撼神殿！曾经竭力保过巴图的乌木德和达排长（在巴图手下任过多年排长）等也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说：“昨天我们保巴图完全是受乌、达两排长的挑动，受了骗上了当”。

这次大会是真正地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也是教育群众、提高大家思想觉悟的大会。阿拉旦浩日格的达力哈庙喇嘛在大会的教育下，把隐藏多年的九支枪，也当场交了出来。通过这次大会，立即掀起了一个检举揭发坏人的高潮。同时一些武装

残匪纷纷自首。凡坦白交代问题的人，忐忑不安而来，高高兴兴而去，体现了党的政策的正确和无比威力！

注：本文在译成汉文过程中，进行了些考证，对原文略有更改增删。文中小标题系编者增添。

安北县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 及王副县长遇害的简要经过

董 玉 奇

(一)

民国初期，河套地区只设临河、五原二县。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的开发及商业、作坊业的日益发展，在大余太设立了“安北设治局”，以后才正式改为安北县。县政府设在执子补隆，即今乌拉特前旗新安镇。

安北县地域辽阔，东西相距最远点将近四百华里，南北达一百华里。自苏独仑北端南下到东土城子，与五原县为邻；由东土城子顺黄河向东到蓆亥滩，与杭锦旗为界；由西山咀北上，顺大小余太川向东以及东南方向延伸，其南侧归西公旗管辖；北侧由东大公旗隶属；东

南与包头毗连；东北与固阳接壤。乌加河注入县境内的乌梁素海。此海呈葫芦形状，东西四十多华里，南北一百多华里。天暖时期，碧波荡漾，芦苇丛生，海阔鱼跃，鸟鸣长空；严寒季节，银装素裹，冰雪晶莹，真是一望无垠的洁白景象。至于其管辖权问题，据说安北县和西公旗之间还有过争议。

绥远省起义的前夕，安北县政府设有秘书室、会计室、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田粮科、军事科等科室。上自县长下至伙伕马伕达四五十人。警察局设有局长、局员、督察长、巡官、警察等达八十多人。司法处设法官、书记、法警约十人。水利管理局设局长、副局长、股长等约十几人。国民党县党部设书记、执行委员等约四五人。县参议会设参议长、副议长等约三四人。国民党三青团设书记等约三五人。全县只在大余太建立了一个区公所，设区长和民、财、建、教、指导员以及区警约十几人。各乡正乡长委派，副乡长民选。下设户籍、财粮、民政、警卫等干事，共约十几人。各保甲都设保甲长，由民选，不支工

资。此外清剿团、自卫队属于地方武装，以后改编为保警大队，设大、中、分队长，连同士兵约一百多人。

全县根据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按三片划分设乡。在横贯东西的乌加河以北设大理乡；在乌加河以南，乌梁素海以西，黄河以北，设有太富、太亨、太安、太有、太贞、太兴、太余等乡；在乌梁素海以东，设有余智、余仁、余勇、余忠、余信等乡。另外在新安镇附近设有联保，直接归县政府领导。县境居民大部分由晋、冀、鲁、豫、陕、甘等省迁来落户，约三万八千多人口。

解放前在农业方面，除了可耕地以外，约有百分之七十的未垦地，长满了哈马儿、芨芨，十分荒凉。在可耕地中，除百分之十五归公田地，百分之五归劳动人民所有外，其余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归地主富农占有，他们雇用佃、雇农，采用“跑青牛犊”、“轮歇种植”等方法耕种。以产糜子为大宗，另外还产小麦、莜麦，一般亩产一、二百斤左右。贫雇农辛勤劳动终年不得饱暖，一贫如洗。他们吃的

是“糠菜半年粮”；住的是“一门一窗地下放个半截水缸”；穿的是“虱子烂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这就是当时贫雇农清贫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畜牧业方面，绝大部分牲畜归牧主、地主、富农所有，而他们却用雇工放牧饲养，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由于经营管理和防疫设施、接羔保羔等技术落后，以致繁殖成活率不高，各种牲畜总头数约为三十多万头(只)。

在商业经济方面，主要以新安镇、大余太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中心。有绸缎店、京货铺、杂货贩以及各种作坊加工业，主要供给大户富户消费享用，一般平民除买点盐、油、烟火之外，很少购买值钱的东西。有的户买不起布，母女俩穿一条裤子，妈妈穿上裤子外出时，只好让大闺女盖张破被子呆在炕上。

在教育事业方面尤为落后，成人识字者寥寥无几，学龄儿童入学率很低。全县有完小四所，有一至四名教师的初小十八、九所，学生总数约一千多人，而且设备极为简陋，绝大部分学校是泥桌、泥凳、泥黑板。

在交通通讯方面，有一条横越东西的公路，可通向包头、临河、陕坝、宁夏；有不少木板车路可通往乡村各地。如去余太时，走南路，得绕西山咀，经过阿拉奔；走北路，要渡乌加河，跨过德岭山；走中路，在海子水解消时靠划船过渡，在严寒封海时靠行走冰滩；走东路，要由前山先到后口子，然后返西才能到余太。当时各单位没有机动车、自行车，唯县政府有公马十几匹，区公所有私有公养马十几匹，这就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另外县政府除可以和大余太、台梁、后口子以及套内少数乡公所通电话外，和其它大部分乡公所不通电话，有事需要联系时，只好靠徒步行走或传递公文。

(二)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安北县正式起义。在新政权没有建立，旧机构没有改革之前，所有机关单位的编制和人员的使用，维持原状不动。县长冯铭汤、秘书凌树仁，会计主任张富贵、民政科长李炳武、财政科长程子华、建设科长齐呈祥、教育科长陈建盛、田粮科长

绍昭章、军事科长边蔚平、水利管理局局长李本端、县党部书记田增、县参议长韩士甫、商会会长潘毅生、余太区区长金焕录、保警大队长杨世勋。后来保警队在余太驻防的有教导员兼分队长云占山、指导员范世良、分队长张永明、班长董喜小、副班长张文源、翟记兴以及十几名士兵。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绥远省政府派绥西工作团来到河套。总团设在陕坝，并在五原、安北、晏江和临河、狼山、米仓设了两个分团。四月五日在五、安、晏分团中，又每县组成了一个生产建政工作团，以开辟政权。安北县的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由王正大担任，副团长由张鸿恩担任。其成员有：吴国柱、李修身、刘忠在、张青山、陈三成、李维宪、任德荣、谢生有、李秀岩、吴昌平、谢三小、贾平、杜进彦、皇甫诚、刘根义、左林茂、赵吉和、田俊峰、张进武……。

工作团根据地理环境，按四片分配工作组，每组十人左右，由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带队。第一组以新安镇为中心，由李维宪任组

长。第二组以邓存店为中心，由任德荣任组长。第三组以黑泥池为中心，由谢生有任组长。第四组以大余太为中心，由李修身任组长。工作组深入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了解掌握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消除群众的种种顾虑，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发动群众积极参加生产，以及为以后所开展的减租反霸、剿匪肃特、土地改革等运动创造条件。

五〇年四月下旬，上级派王锦云同志为安北县生产建政工作团副团长。他与王正大、张鸿恩二位团长密切配合，领导生产建政工作团开展工作。

五〇年五月一日，安北县正式组成了县人民政府。原县长冯铭汤调到绥远省城学习，所以县长由生产建政工作团副团长张鸿恩担任，副县长由副团长王锦云担任，民政科长由工作团李修身担任，公安局长由工作团刘忠在担任，建设科长由孙国威担任，教育科长由张尔杰担任，财政科长由程子华担任，除此以外没多大变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职人员先

后离县到省学习，上级分期分批给安北县派来工作人员，所以人事上有了较大的变动。

新的人民政府建立以后，进行了废保建政工作，即废除了原来的乡、保、甲制，而根据各村自然条件，人口分布情况改建为行政村、自然村。此外，为了便于督导基层开展工作，全县建立了四个区公所。新安镇设立第一区公所，由李维宪担任区长；邓存店设立第二区公所，由任德荣担任区长；黑泥池设立第三区公所，由谢生有担任区长；大余太设立第四、五区公所，在大余太合署办公，由王桐林担任区长。接着，各区村配备了一般干部以后，便着手培养农民中的积极骨干，逐渐建立起农会、妇联、青年、民兵等组织，使广大农民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这个时期在起义人员中，绝大部分同志拥护人民政府，执行新的政策，老老实实从事着本职工作。但也有个别人，因旧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新的立场观点尚未确立，所以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妄想东山再起；在地富豪绅阶级中，有的人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进

行垂死挣扎，他们勾结反动势力，私藏武器，威胁拉拢群众，与新政府作对；至于特反分子则隐蔽起来，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煽风点火，挑拨是非，唆使散兵游勇，扰乱社会治安，鼓动起义部队哗变，杀害人命。

所以当时安北县尽管起义了，而上述这股反动逆流气焰十分嚣张，形势仍很严峻。无论白天黑夜，随时可以听到枪声，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工作团住在西树园的一所院子里，曾发现有人投掷手榴弹，幸而没有造成伤亡。工作团人员下乡开辟工作时，人地生疏，良莠莫辨，一旦遇上匪徒，就性命难保。至于有些贫苦群众，由于觉悟不高，再加上受了坏人的煽骗而有顾虑，不敢与工作团人员接近。当时开展工作谈何容易！然而分配来安北县工作的同志们，不怕劳累，不惧艰险，成天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终于通过剿匪肃特、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斗争，扫清了种种障碍，建立起新的政权。

(三)

五〇年秋，上级派李向克同志任安北县政委兼副县长。王正大政委调离安北县另有任用。从此，安北县的生产建政工作团，除抓三秋、生产等工作以外，还着重深入农村，宣传各项政策，用新旧社会对比等方法，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扭转了贫苦群众不敢接近工作团的现象，逐渐出现了团结在工作团周围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培训了一批农村基本骨干、积极分子，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人民政府撑腰作主下，成为开展各项运动和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力量。

五〇年八月份以后，安北县的中心工作已经由减租减息转入反霸斗争。在斗争中对个别抗拒减租减息的分子；对在旧社会里血债累累，解放后仍不低头认罪，反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分子；以及罪恶滔天民愤极大的官僚恶霸等，展开了斗争和镇压。大大地孤立并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树立了农民当家作主的信念，同时解决了农民的具体困难，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开创了安北县的新局面。

五〇年冬，起义部队调离安北县，到河北

省进行整训和民主改革，五〇部队、蒙骑四师来安北县驻防。这些部队，在与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下，开展了剿匪肃特运动。

当时流窜在包头、固阳、安北一带，骚扰人民，抢劫民财的土匪，以包头的张崩芦、固阳的王毛仁最为厉害。尽管解放以后，在新政策的感召和武力镇压下，解决了他们一大部分人马，但他们还有不少人，仍然持枪荷弹，为所欲为，群众恨的要命。至于潜伏的武装匪特、不法地主、恶霸、暗藏的敌人等，其反动性和危害性就更可想而知了。为了打得准打得狠，彻底肃清这些残渣余孽，即发动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地调查摸底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运动开始以后，到处侦缉追捕坏人，不遗余力，大快人心。大余太人称“旱地小台湾”，问题复杂严重，但在骑四师的大力协助下，逮捕了一批该斗争、打击和镇压的对象。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五一年三月，县长张鸿恩调到绥远省行干校学习，由李向克政委兼任县长。开展了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

对被打击的和斗争的对象，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按照其问题的性质，认罪的程度，进行了不同的对待和处理：有的坦白认罪悔过自新，予以释放；有的交由群众进行批斗；有的顽固不化，拒不认罪，或有血债，民愤极大，则依法予以镇压。与此同时，对没肃清的匪徒仍然发动群众继续进行清剿，没有丝毫放松。

土匪头目王毛仁，原有二百多喽罗，被骑四师在固阳二家山打了一个歼灭战以后，他手下仅留下三、五人，但他们仍不弃暗投明，继续为匪作歹。有一次他与张××二人，各骑一匹快马，在乌拉山后一带活动时，遇到下雨，他二人急忙跑到一个岩石洞里避雨，把两匹马子拴在山洞下面，不想被蒙古族的那森乌力吉，发现了这一情况，便勇敢机智地拉走这两匹马子，而王毛仁等二人并未发觉。翌日，那森乌力吉骑上王毛仁的马，拉上另一匹马，向西公旗所在地哈拉汗奔去。不想在途中又遇见了王毛仁等二人，王毛仁开枪击毙了那森乌力吉的骑马，无法奔跑。那森在急忙中换乘了另

一匹马子，才逃脱了危险。他跑到旗所在地，向政府报告了匪情，并把这匹马子，由旗政府交给剿匪部队骑四师使用。从此，王毛仁只好徒步行走。尽管如此，还没有很快把他逮住。我和刘在棠二人还和他打过交道，我们没逮住他，反而拖延了消灭这一大害的时间。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五一年冬季，领导上派我去大余太清仓调运粮食，派刘在棠去搞税务工作。我们为了当天到达目的地，从早晨即入了乌梁素海冰滩，朝着老乡所指的目标走去，由于冰滩滑得可怕，几乎走三五步就要摔一跤，大大耽误了行进速度，到太阳偏西时才走到对岸沙滩上。我们在疲惫饥饿中找到二寡妇店，饱饱吃了一顿小米捞饭以后，太阳就快落了。这里离大余太约有五六十里路，沿途还经过不少沙丘、沙漠地带，这天无论如何也赶不到余太了，于是我们决定住下，翌日再走。

这时来了个老乡穿戴的人，与二寡妇在里间屋里嘀咕了一阵，便匆匆走去。这人走后，可能二寡妇出于对工作人员不应隐瞒真情的想法，便向我俩报告说：“刚才来的是土匪头王

毛仁！”当时我与刘在棠认为，剿匪肃特人人有责，见匪不逮还算什么革命干部？决定赶快抓住这个坏蛋。可是，我们知道王毛仁有枪，而且他的枪法百发百中，我俩手无寸铁，纵然有武器也不是他的对手。就在眼看王毛仁快走远了的时候，我们急忙喊出二寡妇的邻居田富才，共同去追捕王毛仁。这时王毛仁不慌不忙，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以后，便消匿在红柳、芨芨滩中，我们只好停下来不敢再追，恐怕被其暗害。大家觉得发现了土匪头又让他跑了，非常遗憾，但王毛仁没有向我们开枪，又觉得十分侥幸。

半夜以后，我们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惟恐王毛仁回来找麻烦。谁想在一阵狂风过后，果然听到砰砰的敲门声，接着进来一个人盘问我们。当时我俩的心情十分紧张，估计来人定是王毛仁的匪徒无疑。我俩在惊慌中，一面回答对方的盘问，一面考虑如何应付这一情况。就在这时，房门口又出现了一个人，把头探进门来，当我发现他头戴红星军帽，身穿解放军服时，奋兴激动的心情，顿时驱散了恐惧不安的情

绪。我跳下炕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原来他们正是军民擒拿王毛仁的联防队。当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大家都很遗憾，如果我们不住这里打草惊蛇的话，那天夜里王毛仁可能在二寡妇店落了网。

当年冬天，王毛仁在营盘湾后面的两眼井一带活动时，被骑四师和地方剿匪人员所发现，王毛仁见势不妙，一鼓气跑到小余太大柏山中。他已经精疲力竭，艰难地爬到一块孤山崖的半壁上喘气，企图再侥幸闯过这一关。不想我剿匪武装，在雪地里跟踪追捕，把他包围起来。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是执迷不悟，继续顽抗，结果被联合剿匪的东公旗公安局长陶格敦葛日勒把他击毙，割下他的脑袋，悬挂在包头等地，以雪民愤。从此，王毛仁这股土匪才彻底消灭干净。

土匪张崩芦手下的五百多人，被骑四师清剿得仅留下三人。五二年阴历正月初二，他们来到后口子村时，饿的不得了。张崩芦一个人进入高树之老汉家里要吃食，其余二匪在院门外警戒。高树之的儿子叫高有泉，住在西房

里，当他发现这一情况以后，急忙出来把张崩芦抱住不放。张崩芦急中大喊，其余二匪立即进院向高有泉开枪，打掉了高有泉两个门牙，子弹从后脖胫中穿出，高有泉一松手，他们三人拼命逃走。接着人们向骑四师报告了这一情况，部队首长一面派医生抢救高有泉，一面派部队跟踪追击张崩芦等三人。恰遇这天也下了点小雪，骑四师部队跟上他们三人的脚印，追到后口子山上，包围了这三个坏蛋，击毙了匪首张崩芦，彻底消灭了这股匪伙。把张崩芦的头也割下来照了像，当余太区召开人代会时，大家争着看照片。从此，流窜在包头、固阳、安北一带的这两股土匪，彻底绝迹，大快人心。

(四)

安北县解放不久，还发生了一起残酷杀害王副县长等三人，然后聚众叛变的严重事件。它不仅震惊了绥远省的各个角落，同时也激起千千万万人民的无比愤恨。这伙叛匪、反革命分子，在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过侦缉、追剿，先后落了网，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处理。

安北县于五〇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以后，决定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以便宣传贯彻各项方针政策；消除群众中的思想顾虑，发动组织群众大搞生产，以及铲除落后群众偷种的烟苗。但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设施条件不足，如把全部代表集中在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新安镇开会，困难很大。于是，决定套内三个区的代表在新安镇开会，大小余太四、五区的代表就近集中在大余太开会。

五〇年五月四日，套内三个区的人民代表，在新安镇桥南学校报到开会，七天以后大会闭幕。各地代表由区长李维宪、任德荣、谢生有等带领，分别回村工作。隔了一天，王正大政委以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的身份，召开了团委会。出席人为张鸿恩、吴国柱、王锦云、刘忠在，还有绥远省政府派来的铲烟团团长张凤来，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团委会，主要研究团委成员分头下乡的问题。会上王正大政委提出要与张鸿恩县长去参加四、五区的人代会时，吴国柱同志

对王政委说：“省委要召开会议，恐怕又要叫你回来。”不同意王政委下去。王政委考虑了一番以后说：“那么，张县长也别去余太去了，咱俩就去附近的一区检查指导工作吧。”这时王锦云副县长主动提出，他要去余太参加人代会。接着吴国柱同志，也要求与王副县长一块去余太。王政委又考虑到他去省委开会走后，县委没人主持工作，不同意吴国柱同志下去。最后决定，派县委秘书吴海同志，随同王锦云副县长去余太参加人代会。由于王副县长去余太还有铲除烟苗的任务，所以又决定，由公安局局长刘忠在派局员夏宣三，带领三十多名警察，一面护送王副县长等人，一面去余太搞铲除烟苗工作。

会后，经过一天多的准备工作以后，王副县长等三人，以及公安局的护送人员都出发了。他们绕过西山咀，踏上去大余太的大路。王副县长和秘书吴海，以及通讯员郝瑞云三人，骑的是旧职县长冯铭汤骑过的三匹快马，他们一路奔跑，当天就赶路一百七十八里，到达大余太。而公安局夏宣三带的三十多名警

察，却住宿在二寡妇店吃饭休息。

翌日，夏宣三带领警察，正在继续向大余太行进中，听说西公旗驻军中，约有一个连人马叛变，已经由南路北上，并发现了零散的叛匪追赶他们的部队，同时还被他们逮住三个匪徒，匪徒骑着抢劫老乡带套缨子的骡子。从这些事实证明，前方确实出现了叛军。所以夏宣三不敢带队再去余太，于这天又返回西山咀，向公安局长报告了叛乱情况，以及逮住三个叛匪的经过，同时还把逮捕的叛匪，送回公安局处理。后来夏宣三又把三十多名警察带回县城。

王副县长三人中，王带一支小手枪，秘书带两个手榴弹，通讯员带一支连发盒子枪。就在王副县长因要去陕坝开会回县时，又向余太工作组李修身同志借了一支连发枪，以备途中自卫使用。另外由闵富之（民政指导员，代理区长职务，人称闵区长）派驻余太的保警队班长董喜小、副班长张文源、翟记兴，士兵杨金宝、李五儿、贾宽仁负责护送王副县长等三人回县，由教导员兼分队长云占山带队执行任

务。他们七人全部骑马带枪，杨金宝扛的是轻机枪。这支人马，按照既定的路线，于天黑以后向余太百奔去。

当李修身同志发现护送王副县长的保警队叛变，出了问题以后，立即挂电话，向县上汇报。但叫了半天叫不通，后来让余太邮电所接后口子、包头，再转接安北，才接通了电话。这时天还不太亮，张县长还没起床，当他听电话机铃声以后，马上起来接电话，由于电话线路转接的太远，讲话听不清楚，不得不借助于沿途话务员，转达出事的情况。

张县长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以后，立即叫起王政委，然后两人去找公安局长刘忠在，让他立即派人去侦察王副县长等人的下落。与此同时，李修身同志也派人打听王副县长等人音信。他还派人把原西水道乡姓蔡的保长找来，讲明情况，要求他协助寻找王副县长等三人。三天以后，这位保长来余太区报告，在德岭山滩里找见了三位烈士的遗体，区上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到县里，接着公安局派出侦察王副

县长下落的范建功，也向县里报告了这一情况。

由于当时气候变热，王副县长等三人的遗体已经霉烂发臭，惨不忍睹，谁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恨，说：“真惨呀！想不到王副县长等三人，竟无辜牺牲在德岭山下！更想不到，就是护送他们的人，杀害了他们……。”

安北县召开了追悼大会，各机关、单位、团体、学校的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和广大群众到会悼念，不少单位送了花圈挽联。由县长张鸿恩主持，由政委王正大致悼词。他以沉痛的心情介绍了王副县长是陕西延长县西蛇村人，出身贫苦家庭，很早参加了革命，曾任过团级职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经战斗，多次负伤，作出了重大贡献。“九·一九”绥远省起义以后，他怀着解放绥远建设绥远的愿望，来到安北县工作，谁想到他竟和出生在山西偏关县的秘书吴海，及出生在丰镇县的通讯员郝瑞云，牺牲在德岭山下，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阴谋策划的滔天罪行！这笔血债一定要清算！他还激动地希望所有革命干部、广大群

众揩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行动起来，侦缉匪特依法惩办。

五〇年秋，秘书吴海的哥哥来到安北接洽以后，用木板车把吴海的灵柩运到回山咀，用划子顺退水渠送入黄河，然后顺黄河用大船漂流回山西偏关县。王、郝二位的灵柩，存放在南树园一间小房里，用泥把小房抹严，直到五〇年冬季快过新年时，上级通知把这两付灵柩运往呼市。登程之前，新安镇李生益，在一个通宵里，冒着严寒，照上蜡烛，彩画好棺木。然后雇用刘元厚及毛天恩两辆木板车，由赵玉山同志押运，从新安镇走了整整四天，才到了包头，又等了十七天，集结到七付灵柩运到呼市，埋在烈士陵园里。王副县长的女儿，长途跋涉，来到安北县时，连她父亲的灵柩也没见上，只好去呼市烈士陵园里哀悼祭奠。

至于王副县长等三人究竟是如何被害的呢？（以下系根据这伙叛匪的供词及司法部门的档案资料所整理）。原来，在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天黑，王副县长等三人和护送的保警队

人员离开余太以后，经西水道村向西奔跑，由副班长翟记兴在前面带路。翟记兴根本不走正道，他专门领到芨芨滩里左拐右绕，经过一番艰难地奔走，来到德岭山红山口荒无人烟处，在王副县长三人毫无半点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先由云占山开了枪，接着张文源、翟记兴、杨金宝、董喜小等也都开了枪，射击王副县长等三人。王副县长首先被张文源击中，接着秘书吴海被云占山击中，他二人倒在血泊里牺牲了。留下通讯员郝瑞云仅十八、九岁，因为他是跟随王副县长的，所以也没有逃脱他们的魔爪，同时被害。这伙匪徒夺得了三支手枪三匹大马以后，云占山便命令大家上马返回余太附近的得宪补隆，与范世良会合。翌日，在范世良家吃的饭。

范世良为什么在这个村呢？原来在五〇年的二月份，上级调他到绥远省城去学习，他走到包头以后又返回余太。五〇年三月，杨世勋派他去太阳庙与匪军联络领番号，（即拉出保警队以后，杨世勋当司令，范世良当团长）结

果没有联络上，于是他把家搬出余太城。当王副县长下乡到余太时，杨世勋派李天祥给范世良送了个密信说：“王副县长已到余太，不要让他回去”，准备叛变。于是范世良找云占山密议：“送王副县长等三人回县时，在半路里打死他们，到时候首先由云占山开枪，然后相随的人一齐打枪，事后拉走队伍。”当云占山照计划行事之后，所以返回得完补隆与范世良相晤。范、云二人在暗中策划和威胁煽骗下，于王副县长等牺牲的第二天，拉上余太城里的士兵何占荣、李天祥、李正武、王蛇、许喜财、李应禄、陈士珍、梁占禄……等十儿人，全副武装骑马叛变。他们向西奔驰，在石纳干住了一夜，然后去投叛军芦万惠部。

王副县长等遇害的第三天，杨世勋和中队长武正安赶到余太，扬言要追赶并消灭云占山、范世良等叛军，结果他俩西去叛变。接着藏在白彦花他家里的张永明和柴楹二人也去追赶云占山投奔芦万惠部叛变。一个月以后，他们这伙人在黑沙兔被骑五旅收编，在五原邬家地驻防，原任安北县长冯铭汤，去五原告诉杨世

勋说：“政府要抓你们，快跑吧！”还说他已与西公旗郝游龙部联系好了，让他们快去投奔郝游龙部。于是在骑五旅准备缴这伙匪徒的枪时，杨世勋便带这伙人，到北山畔一带活动，然后投入郝游龙部。五〇年七月份郝游龙部又要缴他们的枪、马时，范世良又带上人投靠起义过来的张汉山部，以求隐蔽。

这伙匪徒在流窜的过程中，无所不为。张文源在莫楞河、大树疙瘩一带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翟记兴在本县刁抢过民马；董喜小在骑五旅时集结十余人，到河西抢过民马五匹；何占荣也抢过一匹民马。后来这伙匪徒怕露了马脚，便分散行动，各自逃生。可是，在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中，任凭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任凭他们如何狡猾隐蔽，终逃不脱人民的天罗地网，先后归案。按照他们的罪恶大小，坦白认罪程度，以及区别主谋协从界限，分别予以镇压和应得的处理。

范世良：指导员，固阳人，由郝游龙部投靠到张汉山部，以后又投奔张璞部，五〇年九月隐藏在固阳，改名刘丑小，被群众发觉后逮

捕。五一年四月十九日收案，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张永明：分队长，住余太白彦花村，五〇年七月回家后被发觉扣捕。五一年四月十九日收案，五一年十月五日按叛匪执行枪决。

董喜小：班长，余太人，从张汉山部逃回余太，潜伏在后山一带，被人民检举揭发后逮捕。五一年二月收案，五一年三月九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张文源：副班长，余太十三份子人，在走投无路时，混入36军及张璞部，以后改名鄂占山，又名张仓小，参加抗美援朝时被发现。五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收案，五三年一月十七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翟记兴：副班长，余太通顺泉人，他从郝游龙部又投奔其它部时，回到余太，被群众告发逮捕。五一年四月七日收案，五一年四月八日按叛匪杀人犯执行枪决。

何占荣：兵，余太淖印商人，被骑五旅收编后逃跑，潜伏流窜在三湖河、包头、萨县一带。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收案，五一年八月二

日按叛匪判处监禁十五年。

李五儿：兵，余太南库联人，投奔张汉山部以后，五〇年六、七月间回余太自动交代问题，禁闭七个月后释放。

贾宽仁：兵，余太九份子人，在张汉山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受过警告处分。五二年回村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柴楹：余太区的财粮助理员，山西人，他潜伏在山西太谷县，参加了工作。五五年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对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交代从宽处理一文以后，请假来绥远公安厅投案。当他回到安北县以后，曾在桥南戏台上，向干部群众坦白悔过认罪。根据中央当时的政策精神，宣布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发给路费仍回山西工作。

杨世勋：保警队大队长，萨县人，在策划部下叛变杀人以后，走投无路，曾投奔张璞部，后来潜伏在萨县被捕。省公安厅送回安北县执行枪决。

云占山：教导员兼分队长，土旗人，在走投无路时，混入起义部队，据何占荣反映从朝

鲜抓回后枪决。

另外，武正安系中队长，杨金宝系兵，逃来逃去均被扣捕，据说杨金宝判了无期徒刑，武正安判了有期徒刑。

(五)

总之，安北县在解放初期，形势复杂险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武装土匪骚扰人民，地主恶霸气焰嚣张，至于特反分子更为恶毒猖狂。自从工作团进村以后，经过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展开了肃剿匪特、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使安北县沿着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的道路上前进，从而达到真正的解放。但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是在恐怖险恶的环境中，枪林弹雨中，用革命干部的汗水和先烈们的血肉换来的。不经过当时的激烈斗争，就不可能有三反、五反、土改、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运动的顺利开展，更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

在祖国阳光普照，繁荣兴旺，四化建设蒸蒸日上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忘记在那不平凡岁

月里的种种经历，不能忘记在参加过建政运动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英雄。

王锦云副县长虽然与世长别，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为了悼念三位先烈，经安北县人民政府，报请绥远省转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把他们遇害的德岭山，改名为锦云山，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乌拉特前旗政协供稿）

回忆我在西公旗等地当户家军 日伪警察—国民党军—最后 投诚解放军的坎坷经历

贺太保忆述 罗布生那木吉拉

张世杰整理 仁钦翻译

我年近古稀。回忆在这近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所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前半生的经历更是曲折而复杂。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才走到人生的正确道路上来。

关于我前半生的经历，虽然是我个人的历史，但也有着时代的烙印。如实地把这段历史记述下来，对于搜集史料大约不无裨益吧。

一、由户家军当日伪警察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者在侵入归绥、包头、余太等地以后，又长驱直入地侵占了我

们的家乡乌拉特三公旗，使我们三个旗的蒙汉各族人民沦陷为亡国奴。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也是民族的耻辱。凡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当同仇敌忾，奋起抗日，为驱逐日寇，还我河山而战斗。

令人惊奇的是，驻在河套的国民党杂牌军司令武驼羔和他的第二团团团长张廷西，畏敌如虎，不敢言战，可是反过来，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把被敌人占领下处于水深火热的蒙族人民当成了敌人。他们趁日军刚来，站脚未稳之际，经常率领匪军偷袭我们的家乡，进行骚扰和抢劫。如抢走我家的八匹骏马和头戴、衣物，并用非刑拷打父老兄弟，勒逼财物。致使居住在查斯太山、阿日乎都格一带的牧民不能安身立命，不得不在炎热的夏天里，陆续搬到希热山和海流图附近去住。甚至连管旗章京仁钦巴拉也和牧民一样搬了家。

但是用搬家的方法来躲避匪徒，是消极的，被动的。它既不能阻止匪徒们不来，又无法抗拒匪徒们抢掠。尽管我们搬了家，可匪徒们依然接连不断地骚扰草原，掠夺牧民，给我们生

产和生活造成莫大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生存下去，乡亲们的共同的认识是，必须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才能防止匪徒的骚扰。在秋天的时候，由乌兰努德苏木四十四岁的牧民查干班德出头，组织了十几个青年，集资买了两支步枪和火枪，老毛瑟枪等武器，成立了保卫家乡的自卫队伍。由于这部分人都是由牧民各家各户组织起来的自卫力量，所以我们称它为户家军。当时，我也是这个队伍里的成员。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多数人都是好枪法，特别是查干班德和他的儿子们是有名的神枪手。因此，尽管我们的武器少，人数不多，但都对保卫家乡，打击敌人，充满了信心。

我们的队伍组成后，立即奔赴海流图河两岸，防御进犯之敌。正在此时，传来了傅作义部骑四师团长乔二安率匪军二百名越过查斯太山，直奔海流图河来的消息。这些匪徒一向到牧区抢掠，如入无人之境，从来没有受到挫折，这次他们又大摇大摆而来，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我们会伏击他们。

事前，我们把队伍埋伏到海流图河畔，不久，匪徒们便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查干班德一声令下，我们朝匪徒一齐开了火。在匪徒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次交锋，便打了一个大胜仗。计：打死、打伤匪徒三人，缴获步枪三支，战马四匹。这次战斗，不仅打掉了匪徒们的威风，同时也壮大了我们队伍的胆量。从此，匪徒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来牧区掠夺。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匪徒的抢掠基本停止，我们户家军也都回家从事牧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春季，武驼羔部下的十几个匪军，窜到东宝尔汉图河畔，把赛音敖木图一家抢劫一空，又把那顺吉尔格勒的二百多匹马全部给赶走了。户家军闻讯后，立即集合起来，赶到额莫根图截击敌人。在短短几分钟的战斗中，打伤匪徒两名，活捉一名。缴获全鞍马四匹，步枪六支。除了打散一些马匹外，还追回了一部分马群和一些头戴、衣物，都交还给失主。

这一仗打得漂亮，也很出名。以后匪军们见到户家军就心惊胆战，望风而逃。户家军的

名声威震后套。

户家军的声威日高，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驻在王府的日本顾问通知我们，没有番号的部队，不许存在，并逼我们解散。当时，查干班德派我和生格二人去乌拉特西公旗与伪保安团长那顺乌力吉联系，愿编入他的团里。那顺乌力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将我们编为他团里一个班。任命查干班德为班长。这样，我们这支队伍才得以存在。

在我们得到番号并被收编后，因为一九四二年基本上没有具体战斗任务，我们都回到家里搞了一年生产。

及至一九四三年时，奉伪乌兰察布盟公署命令，将我们自愿组织起来的查干班德班、色波勒班、散皮勒班合并起来，另外，又从牧民中招收一些人。一共凑到五十人，与中公旗部分保安队组成伪国境警察部队，从此，我们由户家军变成了日伪警察。

从当上伪警察后，我们就象抓在人家手里的念珠，由着人家随意摆布我们的命运了。不久，便以换防的名义，把我们调到由日本人

开采的中公旗珠利格太矿上，（产云母、珍珠石、水晶、茶晶等），为日本人站岗放哨。这时，查干班德因年岁大，不适宜当兵，被打发回家为民。

我们的警察大队长由宝音贺希格担任。大队下设两个小队，第一小队，由我担任队长；第二小队，由那格仁泽担任队长。队里有日本教官，掌握全队实权。当时的教官叫普如吉（日语发音），他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为人阴险毒辣，他每日都折磨着我们这一部分人，令人无法忍受。如西公旗体弱病重的小青年特木勒，就是在普如吉的折磨下死去的。再如小青年巴图乌力吉的两只耳朵，也是在普如吉的折磨下被冻掉的。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和尼玛道尔吉、丹必少勒吉德、楚鲁木桑布共同商定逃离伪警察队。为此，我们苦练杀敌本领，互相鼓励，暗中使劲，以等待外逃机会的到来。

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是我们约定的外逃时间。按照统一行动，我们八十多人一齐动手，缴了其他人的枪支；因为骑乘不够，

又到附近牧民家中抢了一部分马匹，由其他几个人领上大家逃走了。当时留下我来应付日本人。

在我们外逃时，正值日本教官普如吉不在家。事情发生后，早有人跑去报告，因此，在黎明之前，普如吉就赶回矿上。他回来后，看到唯独我一个人没被缴械，顿生疑心，便对我进行严厉的质讯。我答复：“因为我听到动静后，把枪藏起来了，所以没被缴械。”把事情遮掩过去。

天亮后，普如吉一方面让我去追赶逃兵，要求他们回转警察队，另一方面，又派人去中公旗王府联系。不久，中公旗协理巴图毕力格、管旗章京那仁和旗保安队长孟格图斯日古楞都来到珠利格太。那时我也回来报告了逃兵的要求。于是，决定由王府官员到希热庙与逃兵谈判。

在谈判中，逃兵提出了三个条件，即：（1）撤销宝音贺西格的大队长职务，由贺太保担任大队长；（2）不在珠利格太矿上驻防，要求换防到山木岱庙；（3）不吃红高粱面，要吃

白面。对于这三个条件，巴图毕力格协理都一一答应了，并立即兑现。

在我们进驻山木岱庙后，感到一切活动都比过去自由了，生活条件也大大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认为只有自己奋斗，才能有前途。关于逃走时所缴获的枪支和抢来的牧民马匹，也都归还了原主，没有给任何人造成损失。

二、由日伪警察投靠国民党部队

我们驻进山木岱庙的一个月后，突然，伪乌兰察布盟公署警官韩葆乘车来我们这里。他来的任务是打听上次逃离事件主谋者的名字。他走后不久，即去了川井。临走时说，三天后还要回来。对韩葆的来去，我们十分怀疑。经我们共同研究分析，一致认为此事对我们不利，如不逃走，将大祸临身。于是决定立即逃走。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八十个骑士从山木岱庙出发了，天色黎明时分，我们赶到宝日罕南山秀图休息。那天在路上听到牧民乌木德

说：“追捕你们的中公旗中队已经出发了。”及至我们逃出第三天天亮以前，听到在乌木德家那个方向，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半天才停下来。后来听说，那是中公旗中队出动的五十余人，在围捕我们的过程中，发生了误会，自己打了自己。

从山木岱庙出来时，我们便派代庆阿和夏日罗布生两人去后套与西公旗奇俊峰司令手下团长郝跃飞取得联系，愿投靠国民党。郝跃飞转告给郝游龙。后来国民党三十五军派一个团支援我们，这才打退了中公旗的追捕部队。这是我们逃出来的第五天头上。

在我们走到道老岱庙附近的地方，便听到伪蒙军逮捕了我父那顺敖其尔和爱人那木达，并带到川井关押起来的消息。此时，我心中虽然十分难过，但没有动摇我投靠国民党部队的决心。我们到了同义隆，当地驻扎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张司令给我们补充了粮食并发给了通行证。我们便一直奔陕坝而去。

到陕坝后，我首先拜见了奇司令。并对她说：“现在我把部队带来见本旗司令。我们唯

一的目的就是不愿作亡国奴。今后我们紧跟奇司令，打回老家去。”说罢，我向奇司令行了跪拜大礼。奇司令说：“你胸怀大志，转战南北，是民族中的仁人志士，我对你十分敬佩！现在你们背井离乡，远道来归，足见你们的真心实意。”

随后，奇司令带我去见傅作义先生。傅先生对我们的起义来归，深表嘉许。并答应给我们补充枪支、弹药、服装、粮秣。当时，他命令：（1）任命我为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部独立连连长，驻防在千里庙；（2）军粮、马料由同义隆供给；（3）军装、枪弹向陕坝领取。

一九四四年七月，傅作义出兵攻打川井，命令由我连带路。我们因事动身晚了一些，等走到巴日哈山的时候，攻打川井的傅部军队已撤了回来。两军会合后，他们给我连的任务是：截住从东南方向来的伪蒙援军，切断从川井逃跑的日军退路。夜里，我们从巴日哈山北动身，在川井东南等待阻击敌人。傅部军队也从巴日哈山出发，二次攻打驻在川井的日军。

战斗结果，傅部军队再次失利，最后退回后套去了。

我们连虽然也从布隆德尔斯撤出来，但没有退回后套，在呼如木图附近开展了游击战。

八月十二日夜间一时许，我们从呼如木图的东南方向出发，袭击了驻守准扎很宝力格的中公旗东队，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活捉了正在寻欢作乐的队长孟格图斯日古楞。我们把他们的蒙古包也搬回阿日呼都格搭起来，供我们居住。

八月十五日，我们得到的情报说伪蒙军要捕捉我们。我们把部队转移出去埋伏在两旁，留下一座空蒙古包作钓饵，单等敌人上钩。果然不出所料，此夜伪蒙军出动三百余人团团围住了蒙古包。我们伏兵四起，展开进攻。但终因我们人少，寡不敌众，只得兵分两路，且战且退。经过半天的战斗，我们转败为胜，打伤敌伪多人，打死战马三匹。至于那顶空蒙古包，也在战斗中被烧毁。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准备攻打珠利格太，

中途行至阿尔其山的时候，巧遇开往包头方面的日军，我们立即予以截击。战斗结束后，计：打死日军八人，活捉了西公旗特务机关日本顾问敖卡拉（小仓茂）。我们把敖卡拉送到奇司令处，曾受到她的表扬。

九月三日，我们在哈太山东侧吉日嘎与东公旗伪蒙军交战中，俘虏了十几个日本人。其中有日本顾问那卡扎哇（中译名）。正当我们要处理这些战俘的时候，我的老朋友，东公旗伪蒙军队长拉布哈和苏木章京宝日呼二人带上烟土、纸烟、布匹等礼物来我处，请求释放日本俘虏。他们说：“你们要杀害日本顾问的话，日本人必定在咱们乡土上寻求报复，一定要招致乡亲被杀害，生产被毁灭的不堪设想的局面。为了保全乡亲们的生命、财产，请你无论如何释放这些日本人。”在老朋友的再三恳求下，从大局出发，我们考虑同意释放日本俘虏。但是当场放回去，又怕东公旗特务机关怀疑宝日呼他们通敌。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故意放松俘虏的关押，让他伺机逃跑回去。

同年腊月，奇俊峰司令命令我们连协同国民党三十五军攻打驻山木岱庙的伪蒙军。十二日，我们和三十五军在巴日嘎素太住了一夜，十三日，向山木岱庙的伪蒙军发起进攻。因为敌人设防牢固，势力强，火力猛，经过半天的激战，三十五军由劣势到无法抵抗，最后溃不成军，纷纷躲到丘壑峡谷内藏起来。个别人吓得懵头转向，乱窜乱跑。最后还是我们把这些入收拢起来，送归大军、转回后套。

我们原是由牧民组成的保卫家乡的队伍，刚组成时，全部人员都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其后，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人员成分日趋复杂，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队伍的思想、作风逐渐地起了变化。尽管我们三令五申要求士兵遵纪守法，但一些人阴奉阳违，离开军营就胡作非为，有的抓差、抢劫，有的侮辱妇女。如有一次，派旦必包勒吉分队去探听珠利格太驻军情况时，在途中，他们闯入东公旗协理包音吉尔格拉家中，抢劫财物，惹下大祸，让人家找了我们许多麻烦。虽然我们归还人家一切财物，但造成的影响一直不好。

三、日本投降前后，参加统一西公旗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奇司令命令我：“日本鬼子快要垮台了，你部一定要占领西公旗傀儡政府”。我奉命后，立即率部到余太城外得虎子布隆住下，就近侦察日军的动向。有天，民间给我们送信说：“余太城里骑自行车的人络绎不绝，看来今晚日军要有行动。”根据这个情报，我们命令部队白天休息，等到天黑以后，把部队带到西边十里外的芎芎滩里埋伏起来。次日黎明，有近百个日军全副武装包围了得虎子布隆。正在我们伺机伏击之际，不料日军内部发生了误会，互相对打起来。这样一来，打乱我们的部署，伏击战没有打成。

后来，我们部队进驻东萨德盖庙。在那里探听到伪蒙军要包围我们的消息后，我们也是在夜间把人马三五成群地分别埋伏在东萨德盖庙附近，等候敌人的到来。在天亮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竟开来八汽车日本兵，包围了东萨德盖庙。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对方受伤数人，我们也阵亡了一个士兵。

八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

立即从东萨德盖庙出发，越过乌拉山，接收了位于哈拉汉布隆的伪西公旗政府。经与协理额尔和道尔吉、梅林章京焦太保、扎兰章京那顺巴特尔等人商定，派连长额日和木巴雅尔去陕坝接奇司令回旗。

奇司令返旗后，经协商：奇俊峰仍任司令，她年仅十岁的儿子阿拉腾敖其尔继任西公旗扎萨克，额日和道尔吉、沙格德尔任协理，阿拉坦朝鲁、焦太保任梅林章京，那顺巴特尔、朋斯克巴泽尔、阿敏达瓦任扎兰章京。从此，合并了两个政权，统一了西公旗。

四、与郝游龙关系破裂的由来

乌拉特西公旗历来是以内部混乱，争权夺利而出名的。旗保安团团团长郝游龙，蒙名叫陶格陶呼巴图，是一个不知羞耻、骄气十足的家伙。依靠其父色林布协理的权势，狎妓酗酒，压宝吸毒，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参加了包头附近的哥老会，当上了日伪时哥老会的小军官。一九四五年春，他又去后套，投奔西公旗扎萨克的夫人奇俊峰，当上旗

保安团团长。一九四七年，他和协理额日和道尔吉（汉名额宝斋）的孙女结婚后，又与额日和道尔吉勾结，阴谋杀害了奇俊峰母子二人，自封为西公旗司令。直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绥远省保安司令部才正式承认他为乌拉特西公旗少将军衔的司令。

在郝游龙杀害奇俊峰母子事件发生后，我曾专程来见他。他对我异常谦恭又庸俗地说：

“你也该当团长大人了”。事实上，怕我在杀害奇俊峰母子事件上找他的麻烦，用这话给我吃定心丸罢了。这在后来他没有给我下达过任何任命书上，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后来，奇俊峰的母亲要求查办谋害他女儿的凶手，一直告到绥远省府，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郝游龙、额日和道尔吉二人早已向绥远省党、政、军各方面的头头，送去大量的烟土和钱财，因此，无人替已死的奇司令说话。

然而，这些烟土和钱财是哪里来的呢？这不是凶手们自己掏的钱，而是搜刮民财来的钱。这有伪旗府发出的公告可证。公告说：

“为解决奇俊峰被害事件，特向全旗征集大量

牲畜、金银财宝、鸦片等，以户征纳，用以抚恤被害者的家属。对郝游龙等人的作法，我非常不满，在山后，我向牧民广泛揭露他们的罪行，告诉牧民不要给他们以任何东西。为此，郝游龙对我恨之入骨。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路军开始攻打包头。郝游龙叫我去，命令道：“为了保卫家乡的土地，你要坚决回击八路军的进攻！”我无条件地服从了命令，带兵越过乌拉山等候命令。郝游龙按国民党的指示，把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包头东磴口铁路线以南，命令我部在铁路以北截击。

当时，我一方面对郝不满，另一方面认为八路军人多势大，就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少得可怜的我们地方小部队，岂能顶得住八路军呢？与其做了俘虏，倒不如躲到山里去。这时，两军已经接上火，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乘机机会，我带兵沿乌拉图高勒河槽北上，翻到乌拉山北麓。牧民报告我们说，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张锁子一个团，在包头西哈业胡同被解放军打散，现在山后到处抢

劫。我们侦察好情况后，突然袭击了他们，缴获枪支三十多件，装备了自己。

十天之后，传来消息说，解放军已从包头撤走了。局势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刚到大胜圪旦住下，后脚郝游龙部队也赶到苗园圪旦，正在打听我们的消息呢。

及至郝游龙见了我，先是大吃一惊，但立即镇静下来，他用咄咄逼人的口吻问我：“贺太保你为什么撤退部队，违反我的命令？”我回答：“报告司令，解放军的火力太猛了，连国军都难抵挡，卑人小卒，能有什么办法。”他紧接着又问：“你在沿途干了些什么事？”我说：“没干过任何事”。说罢，他沉默不语，我也就行礼告辞了。

回到部队后，我立即召集大家，把全部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我们该怎么办？”大家很忧愁。我对大家说：“只有找解放军，别无它路。”在一番沉默之后，连长吉仁太、排长布仁特古斯、杜热、色音吉雅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我们去找八路军，如果大家不愿离乡背井怎么办？”我说：“郝游龙肯

定不饶过我们，对他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要脑袋由我一个人顶着，大家不要怕！”

正说着，郝游龙派人来叫我们火速赶到苗园圪旦报到。在我们到达苗园圪旦时，郝的部队三五成群，警惕地持枪等待我们。我仗着胆把部队直接带到郝游龙驻地门前，从院内走出来几个卫兵说：“司令请你到后院里去见！”说罢把我带到后院里。这时，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下场了。

刚跨进门坎，卫兵的枪口早对准我的后脑勺说：“把枪交出来！”我说：“我料定你们会这样干的。接住！给你”。我无所畏惧地说罢，把手枪扔了过去。缴过枪后，他们把我关押起来。这时，从院外传来了缴我部队枪支的声音。

在这里，整整把我审讯了八天。其罪状是：第一，违背军令，从战场上撤退；第二，擅自缴了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枪支，犯上作乱；第三，有投奔共产党的嫌疑等罪状，逼我招认口供。

有一天，送饭的炊事员悄悄地对我说：

“枪毙你的坑已经挖好了。”第二天一早，院里果然传来了人们喧哗的声音，但没提我出去。当太阳快落的时候，房门打开，把我叫出门外，将盖有死刑大印的判决书让我看过之后，便当众宣读道：“贺太保不服军令，擅自收缴二十二军的枪支，预谋投奔共产党。根据上述罪状，应立即枪决。但因有八十多牧民请求赦免贺太保、郝司令开恩，免其一死，将他革职为民。”

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和你郝游龙见高低！

在我被押审讯期间，我们的人各奔前程，其中大多数人回家去了，也有少数人留在郝游龙的部队里。特别是道尔吉色楞、陶格腾格日勒等二十余人，被安排在警卫连里。这是郝游龙一来为了利用蒙古军队的势力保护自己，二来为了维护自己在蒙古地方的声誉和威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此时，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业已回到家乡——海流图河畔放牧去了。

五、枪杀郝游龙的一次尝试

我的同事们多半是住在哈太、希热山牧区的蒙族同胞。他们随郝游龙部队长期住在农村，回不了家，吃不上肉。尤其是到了冬夏季节换不了衣服，冬天没棉，夏天没单；一旦生病没钱治疗，想抽个烟更困难。因此，思念家乡之心倍增，很多人都曾请求回家探望亲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道尔吉色楞、道老金等人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来看望我。并对我说：

“我们已向郝游龙提出恢复部队的要求。大家考虑还是由你出面来领导，我们支持，你意如何？”我回答说：“你们的好意我理解。但是已经离开山洞的道人，再出家修行，又谈何容易。”后经思谋再三，决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最后又共同商定枪杀郝游龙，另立山头。

同年六月，道尔吉色楞、道老金、达林太等人借休假之机，回来告诉我说，已有二十来人表示同意杀死郝游龙。于是，我们商定具体行动时间、地点和联系暗号，这就是：七月十八日动手，道尔吉色楞举白旗，我举蓝旗为双方的联系暗号，在明安川常太永双方挥手相见。我从乌拉特东公旗保安团团团长宋布尔那里用一

匹马换回来一支手枪，作为决定郝游龙命运的主要武器，交给了道尔吉色楞。六月五日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勉励，分手告别了。

分手之后，我从东公旗部队里搞到两支枪，又从别处买回一支步枪，发动老同事宝木色楞、仁钦道尔吉等人，于七月十八日赶到了约定好的地点。可是等候了一整天，没见什么动静，真使我们疑虑重重。因此地驻有郝游龙部队，我们又不能直接折回，在傍晚时分，我们采取迂迴撤退的办法，先向东直奔营盘湾，再向右转到沙日玛河，然后朝北回到驻地希热山。这时我们心情沉重，不知身在敌营弟兄们的安危。

事情原来是这样：六月五日我们分别之后，道尔吉色楞在途中患病拉血，无奈住在山后一个牧民家养病。同行的道老金、达林太等人便挑起枪杀郝游龙的担子，赶到警卫连，传达部署了连长道尔吉色楞的重托，当下他们很快组织起精明强干的好枪手，准备于十八日结果从下庙子开会归来的郝游龙。但出人意料之外的

是，这天，郝游龙没有回来。

第二天中午，郝游龙驱车回到哈业胡同时，他的警卫连长那木吉拉出迎，接到自己的房间，随从们都到东西院休息。这时，我们的人便从西院动手缴枪，遣老金、陶格腾格日勒把住大门口，达林太翻过院墙执行枪杀郝游龙的任务。不想，在这关键时刻，达林太慌张起来，急急忙忙地打了郝游龙一枪。由于没有掌握好准头，子弹擦头皮而过。老奸巨猾的郝游龙，急中生智，乘机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活象一具尸体。当时达林太认为郝游龙已死，没再开枪。

郝的同党王树德向窗外猛射几枪后，便中弹死了。警卫连长那木吉拉怕的要死，在屋里使出吃奶的劲来，高喊：“军人同胞们，不要开枪了！有什么事好说好商量。”陶格腾格日勒说：“你快出来，没你的事”。话音未落，那木吉拉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大喊：“饶命”。被陶格腾格日勒顺手一枪打翻在地，立即呜呼哀哉了。

陶格腾格日勒在外面趁势一跃跳上屋顶，

返身从窗口往屋里扔进一颗手榴弹，但被狡猾多端的郝游龙顺手又给扔出来。此际，在东院休息的郝游龙随从，朝西院向陶格腾格日勒猛烈射击，与此同时，从东面又开来了两部卡车，由于寡不敌众，我们只好且战且退。在退到什那干山时，又打退了敌团长卢万惠的追兵。直到二十二日，我们的全体人员才在德尔苏呼都格会合。

在这次尝试中，我们死了两个人：一个叫查干呼日嘎，一个叫利格敦。由于没有完成任务，又失去了两位弟兄，大家深感内疚，士气有些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我鼓励大家说：

“我们没有打死郝游龙，完成除害任务，这固然不好。但大家能安全归来，也令人鼓舞，应该庆贺一番。如今事已如此，骑虎难下，我考虑，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下定决心去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如果大家愿意的话，由我率领大家奔赴解放区。”听了这番话后，大家心里豁然开朗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同意。

这时，道尔吉色楞已恢复了健康。在他归队的路上，接到陶格腾格日勒的信，才知郝游

龙没有被打死。他怀着懊丧的心情正在兼程赶路之际，不想敌人的巡逻兵把他和陶格陶宝及一个随从捉去，在敌营受了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未招认口供。最后敌人让他们活捉贺太宝，他们假意应允后，才得到释放。途中也曾遇见郝游龙的叔父郝跃飞，他不但没有刁难他们，反而给指路放行了。在他们归来后，我们的人员聚集齐全，共有七十余人。

在我们决定去找解放军后，大家各自回家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有些人把家眷搬到阿尔其山里，以防万一。我和陶格腾格日勒把家迁到东公旗，和一个可靠的牧民住在一起，同时把仅有的二百只小畜交给西公旗两户人家，放苏鲁克（分成放牧）为期三年。

几天之后，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正要出发之际，不想我们内部发生了意外的事件。这就是：有人想谋害我，去见郝游龙立功赎罪。对此，我立即采取措施，作了妥善处理。当时，我分兵两路，把准备闹事的吉仁太、都热这部分人调离到乌兰朝鲁山去驻守，对忠于我的陶格腾格日勒这部分人调到哈太山去驻守。由于

我处理的缓和、稳当，防止了我们内部的分裂，也使投奔解放军的秘密没有泄漏出去。

六、寻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

我和郝游龙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继续呆在这里，势必要导致大祸临头，生命不保。但要消灭这个害人虫，只有得到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实现。因此，寻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是我们寻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的起点日。这一天，我们从东哈尔朝鲁起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当我们将要靠近达尔罕贝勒旗的时候，从家乡传来了消息，说十四日我们刚刚出发那一天，夜间，郝游龙的三个团扫荡了希热、哈太、阿尔其山，一路抢劫牧民的牲畜、财物，到处打听我们的消息。为了追捕我们，他们曾打入东公旗境内。

东公旗部队认为他们无故入侵他旗土地，是一种犯境行为，截住不让再前进。为此，郝

游龙部怀恨在心，临走时把旗寺院——陶巴盖图庙抢劫一空。

这时，从我部队分裂出去的吉仁太、都热一路人马也出现了新的分裂，他们多数人投降了郝游龙，少数人在深山峡谷中渡日，也有的回家放牧去了。

我们走上征途的第五天头上，跨进了达尔罕贝勒旗的西境，正当我们准备宿营的时候，该旗掌管军权的梅林章京朝德布仁带着八十个骑兵，拦截我们的去路。他派两个人来告诉我们说：“到呼热图去，得有许可，方能通过我旗。”我们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说吧！”在哄走了那两个青年军人之后，我们便在夜里偷偷地上了敖伦陶勒盖图东山，黎明时到达吉尔嘎郎图北面的牧民家。这时，追兵步我们的后尘，赶来说：“未经许可你们就偷跑了，我们官长命令你们马上返回呼热图去。不然的话，缴你们的枪，或者和你们交战！”我们回答说：“西公旗让我们去找解放军、共产党的，而不是让我们来把枪交给你们。你们让走也得走，不让走也得走！我们决不会在你

们的旗境惹事生非，交战与否由你们定去，武器绝对不能交！”我们作了强硬地回答后，便立即动身。然而，人家早准备下人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当时，我们从容不迫地在他们中间穿了过去。队伍过去后，我和陶格腾格日勒调转马头跳下马来，拜见梅林章京朝德布仁。

因为出来时，我们有所准备，盖有大印的公文纸上用汉文写着“拜见解放军、共产党”的字样，当时，我们把公文交给了他。看来，这位梅林章京大人不识汉字，只看了公章上的蒙文字后，点点头把文件还给我们。然后，说：

“我们要把你们送到四子王旗边界，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表示同意后，这才继续东进。可是，由于过度疲劳，只行了七八里路便在一户人家附近扎营下寨，造饭休息。夜间十一时许，我们又开始赶路，一直到了四子王旗边界，达尔罕贝勒旗部队才回去了。

踏进四子王旗境内，就听到八路军离我们不远的好消息。于是，我们在磴金高勒下营，派陶格腾格日勒前往解放军驻地联系。晚上，陶格腾格日勒回来说：“明天早上，解放军的

毕力格巴特尔等首长，亲自来驻地看望我们”。听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后，大家喜出望外，把一路上的疲劳顿时全部忘掉了。这天晚上睡了个从来没有睡过的甜蜜觉。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大家早早起来把枪支弹药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列队等待着解放军首长们的到来。不久，毕力格巴特尔、图布信、宝音必力格等首长出现在我们队伍面前，顿时，在磴金高勒河畔响起了一片欢腾。首长们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询问一路上的情况等等。

当首长们看见堆好的武器弹药时，就问我们：“这些武器是干什么的？”我向首长们行了个军礼，回答说：“我们是来向解放军投诚的，今天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些枪……”。不等我把话说完，首长们就拦住说：“你们不是从战场上捉来的俘虏，同志们是为了革命，自愿来找我们的，你们的枪，我们不收。这些武器的主人是你们，快收起来。”首长们热情洋溢的这番话，语重心长，说的我们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不由的一股暖流涌上了我们心头。

首长带我们到小百灵地时，一团解放军列队呼口号，夹道欢迎我们。当走近队列前时，领队一喊口令，全队立正，整齐划一地举枪致敬。那飒爽英姿，对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惊叹不已！在这里，首长们和我们一起住了一宿。第二天，在四子王旗王府查干宝力格设宴招待我们。宴会后，又开了大会，我们也上台表示了决心。

接着，为期三个月的紧张军事训练开始了。在这里，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受到了一次启蒙教育，既学军事，又学政治理论。通过学习，使我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了一步，懂得了为什么拿起枪，为谁而战斗的革命道理。我们一起来这里学习、训练的有：陶格腾格日勒、道尔吉色楞、达林太、道老金、额日和道尔吉、孟和巴雅尔、脑敏巴雅尔、宝拉、嘎尔迪、曾格、官布、查干特木尔、却日格、沙日木格、巴图色楞、乌力吉陶高、达瓦和我共十八人。小的十七岁，大的三十七岁。

一九五〇年一月，在军训将要结束的时候，毕力格巴特尔首长又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告诉我们师领导如何安排我们的情况，并征求了意见。首长首先宣布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成员。然后，我们分别被编到师所属的几个团里，我被留在师司令部里任参谋。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解放。十月一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在四子王旗王府召开，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战士，光荣地参加了第一次国庆大会。会后，我师迁驻乌兰花。一九五〇年三月，筹备成立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工作，在乌兰花进行，组织上派我们来地方搞政权建设工作。当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时，我和道尔吉色楞列席了乌盟各族各界的代表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盟级机构，并着手准备各旗政府的筹建工作，我被分到达尔罕贝勒旗人民政府筹备小组，道尔吉色楞分到达尔罕茂明安旗人民政府筹备小组。我们接受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任。其他同志在编到各团后，他们进一步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掌握杀敌本领，为以后的对敌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

权建设工作基本就绪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七、扫荡国民党残余部队

一九五一年六月，原西公旗保安团团长卢万惠起义投诚后，又叛变了革命，带队而逃。我第四师奉命追击，我师从乌兰花出发，路经百灵庙，向西延伸到赫交、郅北、鸱鹤图、巴音查干、希热、宝日罕图河、谷仍沟、乌拉亚斯太山，再向东转到乌兰道布、余太、台梁、莫日根沟，展开了一次大“扫荡”。为了以利再战，我们曾到昆都伦召研究确定了新的作战方案。

八月，从西太阳庙又传来了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作乱叛变的消息。师里让我带一个侦察小分队，到中公旗境内侦察敌情。我接受任务后，和同志们一起赶到中公旗德尔素诺尔一带侦察。从旗公安部队了解到：大约有二千名残匪隐蔽在太阳庙一带深山峡谷里。我们把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师部。随后，剿匪大军立即动身，沿乌拉亚斯太山南麓、千里庙南河槽向西

推进。

接着，我们侦察小分队又到乌兰敖包山脚下的牛场湾附近侦察。这里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一带窝藏着三百多名土匪。我们立即报请剿匪大军围攻牛场湾。这些土匪，正是张疤子、王如义、张德义匪部的残匪。在围攻中，共打死四十人，活捉三十多人，其余匪徒逃之夭夭了。

我军顺苏布图沟北上，到了巴音山岱庙，得到的情报是，在查日格山潜伏着近八百敌人。于是，我军立即包围了敌人，集中火力，突然袭击。这场战斗，共歼敌百余人，俘虏二百来人，只有少数匪徒跑掉了。经过这两次围歼，所剩下的土匪已经为数不多了。

根据匪少、分散这一实际情况，九月份我们采取了化整为零，各个突破的作战方针，把大队分成若干小队，深入到太阳庙山、阿拉坦浩日格山等险山峻岭中歼敌。我和指导员乌恩图带领小分队进到太阳庙山深处，根据牧民陶海提供的情报线索，并进一步侦察的结果证实，王如义在突围后已经躲到这里来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小分队活动的特点，不易采取围歼

的方法，只能采取到敌营里去与匪首见面，说服他起义投诚的方法，才比较有利。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指导员并提出我个人去见王如义。指导员怕我一个人到敌营里去不安全。经我再三请求，他才勉强同意了我的这一冒险行动。

于是，我单枪独马，大摇大摆地走到王如义匪部驻地来。哨兵拦住问我：“你从哪儿来，找谁？”我说：“你们的长官在吗？我是专程来找他的”。说着便大步流星地往里走。但见一黑脸彪形大汉持手枪直奔我来，把枪口对准了我，问我是谁？我回答：“我是西公旗的贺太保，原是起义投诚人员，现在奉解放军命令专程前来帮助你们起义，如果你们起义投诚了，也和我一样受到宽大处理，还可以成为人民解放军”。经过一番交涉后，才知道他就是王如义。当时，王脸色有些不自然：“喏，原来你就是贺太保啊！等我和弟兄们商量一下，再说吧”。说罢，他便集中匪徒头头们商议去了。过了一阵，王如义面带笑容向我说：“我们已经决定向解放军起义投诚了”。

说罢，王立即集合队伍，就地宣布向解放军起义投诚的决定。当时，我让他们放下武器，保持原队列向后退三步。然后招手示意指导员。只见指导员带领我分队战士从山上下来，验收枪支，再把枪栓全部卸下来后，枪身仍然交给他们背上，顺利地送到司令部去。

为了速歼敌人，回头我们又深入到东升庙北山里去。在这里，激烈地战斗了一天之后，俘获了张疤子、张德义等二十余人，基本上清灭了残匪，彻底孤立了极少数敌人，达到了预期的剿匪目的。

一九五一年底，在乌拉特草原上全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从此，乌拉特三公旗各族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定的日子。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我们大部分人转业到地方工作，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在新的岗位上分别投入到经济建设的领域中去。

(乌拉特中旗政协供稿)

日寇侵入河套及五原战役

安春山 宋海潮

按：《日寇侵入河套及五原战役》一文，是刊载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抗日战争中对包头、绥西和五原三个战役的回忆》一文的后两部份。因为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我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故特予转发，广泛宣传，以饷读者。

日寇侵入河套

日寇包头战役遭到可耻的失败后，除把包头司令马厂撤职外，并从平绥、同蒲两路沿线抽调部队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附飞机、坦克和伪蒙军六个师，统归日寇黑田师团长指挥，向河套进行反扑，并限三个月消灭傅作义主力部队。

傅作义侦知敌人企图后，即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在五原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决定对策。在战略上避不利，找胜利，既不让敌人捕捉我主力，又要节节阻击、奇袭、伏击、扰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来不得好来，走不

得好走。并作以下军事部署：

令骑六军及其配属部队，在西山咀、马七渡口地区，阻击由前山方面进犯之敌，迟滞敌人前进后，转移于黄河右岸，威胁敌人的左侧背，机动袭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粮弹，侦察敌人行动。

令马鸿宾军的马腾蛟师，配属其他部队，利用原有在乌镇、乌布浪口的阵地，阻击由后山进犯河套之敌，迟滞其前进，摸清其主力，而后转入狼山，威胁敌人右侧背。当敌人进入河套后，坚持敌后游击，截击敌人粮弹，窥测其动态。

令三十五军为机动部队，和敌人主力作机动战，相机捕歼敌人。所有各部队的后勤人员，转移到磴口、石咀山地区；政工人员除随军作战者外，其余完全换穿便衣，协助地方干部指导人民空室清野侦察敌情，宣传我军作战方法，安定民心，在敌后随时给敌人政治上、经济上制造困难，破坏敌人的后方秩序。

第一阶段战斗经过

骑六军战斗经过。一月末，由前山进犯的

敌人，分两路进犯后套：一路沿乌拉山南麓，包、五公路进犯，被我骑六军二十一团在稽亥滩阻击；一路由黄河南岸西进，被我骑六军二十团在二圪旦湾阻击。入夜后我军转移，敌人继续前进，于二月一日在马七渡口和骑六军主力激战一日，敌我双方损失均重。入夜，我军又转移，敌人进入后套，我军继续在杨高圪旦一带侧击，迟滞敌人约一日。旋即全部转移于黄河右岸惠得成地区。

马腾蛟师战斗经过。二月一日由后山进犯之敌，以飞机不断轰炸，步炮协同，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冲锋，向乌镇、乌布浪口马腾蛟师阵地攻击，战斗十分激烈，敌我伤亡均重。我一〇一师增援，加入战斗，激战至日暮转移。一〇一师向折桂乡集结，敌人即侵入乌镇、乌布浪口阵地。

三十五军战斗经过。新三十一师：敌人侵占乌镇、乌布浪口以后，一路沿狼山南麓乌拉濠北岸前进，到达黑石虎、三女店之间，这时孙兰峰师预先埋伏在乌拉濠北岸芦苇内的九十三团，乘敌行进中，以集中火力侧击，敌仓促

应战，伤亡甚重。黄昏后，不敢夜战，即将其汽车横列在阴山南麓，步兵下车和我军对峙。我九十三团以少数士兵，留在原伏击阵地，流动放枪，与敌保持接触，另以主力由三女店以西沿阴山迂迥到三女店、黑石虎之间的敌人侧背，袭击汽车，从夜间十二点激战到翌日晨三时，破坏敌人汽车数十辆，打死打伤敌一百余名，随即撤入阴山，到万和长占领侧面阵地。

敌人的另一路于二月二日晨，到万和长附近，向我新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九十二团阵地集中攻击，以多架飞机更番轰炸，误认老乡牛群为我骑兵部队狂轰滥炸，将该牛群完全炸毙。同时集中炮火，掩护坦克、步兵攻击续进，战斗极为激烈，我军奋勇抵抗，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突破，新三十一师各团撤入阴山。

二月二日下午，我一〇一师三〇三团阻击敌人，敌人集中炮火掩护步兵多次冲锋，我率利用城堡、围墙反击，并在城外墙角下埋伏轻重机枪，阻击敌人。敌我伤亡甚重，该团团长

王赞臣受伤，官兵伤亡四百余人。午夜撤退，三〇一、三〇二两团沿阴山向西转进。

新三十二师：二月二日下午，向沿包、五公路进犯五原之敌，在四牛头圪旦附近，我军利用敌坦克于沙丘地带不能发挥威力之时，与敌展开激战。敌虽以飞机更番轰炸，步兵波浪式冲锋，终未能夺取我阵地。敌军撤退，新三十二师亦奉命向西转移。

在这一阶段战斗过程中，虽然当时的战略部署是打机动战，不让敌捕捉我主力，避不利，找胜利，但实际并没有完全做到，各部队仍打阵地战。在敌人优势火力下，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至于所谓伏击、奇袭、阻击、扰袭等战术指导，虽属正确，但部队缺乏战斗经验，也未做到。这时，敌人已全部侵入河套，并分数路西进，占领了五原、临河、陕坝、米仓（即今杭锦后旗的三道桥）以及三盛公（即今磴口县）等地。三十五军各师分散潜伏在狼山，米仓及黄河以南碱柜地区，三十五军军部设在临河县东南沙漠的亚马来。

第二阶段战斗经过

二月五日夜，傅作义根据当时战局发展情况，在马来指挥部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大意是：“敌人侵入后套已经五日，到处遭到我军袭击、阻扰，受到一定损失，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在战略上我已完成第一段的任务。各部队仍应以机动游击战的战术，继续打击敌人，把敌人主力牵制和消耗在后套地区，以有利于其他战场。敌主力部队决不能在后套同我军进行持久消耗战，短期内即将撤退。但在敌主力未撤退。但在敌主力未撤退前，我军必须采取机动游击战，在黄河结冰时期，北依狼山，南靠黄河以南沙漠地带相机打击敌人”。此时傅即将军指挥部由马来移到黄河以南的什纳格尔庙。

各部队奉到指示后，新三十一师移囿囿补隆，柳树泉，傅家圪旦等地区；一〇一师移狼山湾，石板匠圪旦等地区；新三十二师沿狼山西进；在铁匠圪旦重创尾追的伪蒙骑兵师后，移蛮会西北贾来宝圪旦等地区；新六旅移万和长地区；均以狼山为依托机动击敌。同时将伤病人员向磴口、石咀山运送，并将缺乏炮

弹，不需携带的大炮和缴获敌人的枪支均秘密埋藏于沙漠之中，经此处置，部队行动更为灵活。但在最艰苦的期间，原中央配属傅作义指挥的马腾蛟和马彦旅撤退到宁夏石咀山，门炳岳军撤退到伊盟桃力民。

这时敌人已前进临河、陕坝一带，因我军及时转移，始终未被捕捉，加以地方实施空室清野，敌到之处一无所得。约在二月十五日敌黑田主力即开始撤离河套。仅留水川伊夫中将指挥的一个日军联队驻在五原，从雁北地区调来七个警备队约步兵千余。协助坚守五原。同时为了缩短战线，放弃陕坝、临河，把六个骑兵团撤到丰济渠以东，布置在五原外围，准备长期固守。

第三阶段战斗经过

敌人撤退到丰济渠以东后，主力部队大部撤回平绥、同蒲两线原防。傅作义即将我军主力转到邬家地以西地区，指挥部由什纳格尔庙移回马来，经过整顿即计划诱敌歼击。其计

划是：一方面令马秉仁率骑兵佯攻五原，诱敌出击，由安北南侧转移到敌后，乘虚占领五原。一方面在丰济渠以东地区，埋伏新三十一师和一〇一师。另一方面令九十三团、九十六团分头袭击蛮可素和百川堡东南的敌伪军，把从五原出击的敌人诱到丰济渠以东地区，由我预伏部队一举歼灭。

二月×日五原敌人果然被诱出来，约五百多名，附山炮一中队，行至丰济渠阿善附近，发现我埋伏在五临公路南侧的九十三团，便下车向该团正面攻击，自早十时战至晚六时，双方伤亡均重，该团三营李良左连仅剩官兵六人。而九十一、九十二两团却因伪蒙军牵制，未能适时投入战斗，尤其是潜伏在渠东的一〇一师和游击军马秉仁部因情况不明，未能向敌侧背攻击，致使敌人逃出我埋伏地区，马秉仁部也未乘虚袭占五原，使这一计划落空。

这时，傅作义深感部队作战不力，除命令游击部队赵炽昌、刘占魁、贺得胜、张文标等部和未整训的安华亭、王子修旅、石玉山骑兵师等部队留在丰济渠以东向五原、安北地区游击

外，即将主力部队三十五军，绥远游击军，五临警备旅等集结在丰济渠以西，进行整顿。

五 原 战 役

一九四〇年初，日寇侵占五原后，企图久踞，以确保包头安全，认为只要有一部分日军和一些伪军，凭恃汽车快速增援，就可固守无虑。因此仅留不足一个联队正规军，其余只是些宪兵队、特务队、汽车队、伪蒙军六个师、伪绥西联军，以及由察南、雁北等地调来的守备队。这些敌伪军，统由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指挥，其兵力部署是：主力部队均集中驻在五原新城（隆兴长），指挥部设在城内原屯垦办事处对面的皮毛店院内，部队分驻在原屯垦办事处，五原平市官钱局，实验小学等处。宪兵队、特务队、汽车队，大部分驻在城内义和渠以东，部队驻处均将院落打通，周围构筑工事，碉堡，并以铁丝网联成一个坚固据点。至于伪蒙军和地方部队，除一部驻在西关、旧城等地外，其余均分驻在五原六十里以内的重要据点：新公中、郝镜桥、蛮可素、南牛根、梅令庙、广盛西等处。而在财主圪旦，

乌加河沿岸，万和长附近乌拉濠上，都架坚固桥梁，驻重兵把守由包头、安北向五原增援的军事要道。在政治上、经济上利用汉奸全喜亭、杜风山和刘子俊等，建立敌伪政权，组织伪五原县政府，并加强所谓宣抚工作。另从日本国内派来二百多名科学技术人员，企图利用后套人力、土地、水利、矿产等，对我进行经济掠夺，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傅作义计划收复五原

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日夜间，傅作义在马来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他说：“在强大的敌人入侵后套，企图歼灭我军主力，我军机动应战，避不利，找胜利，退要退得开，打要打得上，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有些部队不是退不开，就是打不上，如一〇一师三〇三团在狼山湾没有退开就吃了亏。在阿善战役，一〇一师和游击军又都没打上，因此绥西战役我军伤亡甚大，丢失了五原县全境。现在我军究竟用什么办法，这个仗是否还能打？不打该怎么办？打又怎么办？盼望大家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中，有的主张到后方换班休整，

说：“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打日本应该大家来打，后方还有许多部队没打过仗，而我军和日本打仗，比任何部队早，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日战役，经过绥东战役，百灵庙战役，一直到今天，已经七年了，按道理也应换换班，到后方整休一个时期。”有的说：“我们三十五军再打就没有人了，现在弹尽粮绝，增援无望，官兵伤亡过大，如果到后方整训一个时期，还能恢复成军，重新作战；如果继续打，就连根完了。”还有的说：“我们守备丰济渠，在丰济渠以西整训部队。”总的说是主张整训一个时期再打，不主张立刻就打。但另一部分人相反主张，利用黄河解冻时机，进攻五原，收复失地。其中以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新三十一师参谋主任宋海潮主战最坚决，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不打的~~主张~~。因为后套的存亡关系到西北大局的安危，到后方整训一个时期，再打回来，这是幻想。如果退到宁夏，隔有八百里沙漠地带怎么能打回后套？到后方整训希望补充人马枪弹，也是办不到的。我们过去打了胜仗，中央

给我们补充了什么？我们已经打了七年，枪还是旧枪，炮还是旧炮，今天我们打了败仗，丢了五原，逃到后方，不用说补充，马鸿逵能容我们存在吗？即使能允我们，三十五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从此也一扫而光。我们认为仗是可以打的，而且一定能打胜，因为土地、人民、政权都是我们的，我们熟悉地形，老百姓拥护我们，宾主之势对我们有利。五原的敌人日军至多一个联队，伪蒙军不过六个师，而我们的步、骑、炮兵合起来，还有一万多人，敌我对比，我占优势。敌人初到，冬季设防未固，五原新旧两城城墙，早被我军拆除，无险可守，宾主之势我为主，敌我对比我为优，仗不但可打，而且一定可以打胜。但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有的部队长官脱离了队伍，有的擅自退到宁夏，若再象这样打法，不但不能打胜，而失败的更快。为此，必须整肃军纪，严行军法，方可振作士气，才能反攻五原，收复失地。”最后傅作义表示：“大家听见了吧？！我是手指头咬着那个也心痛，但为了严整军纪，维护我军的光荣历史，坚定抗战的必胜信念，收复

失地，不允许我不执行军法。我们不反攻五原，收复失地，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后套去，仅凭丰济渠一水之隔，是绝对存在不住的。我向大家表示决心，誓与后套共存亡，最后剩一兵一卒，也不离开。你们回去迅速整顿军队，准备打仗”。说罢，当场扣起作战不力的绥远游击军司令马秉仁，九十一团团长刘景新。并给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撤职留任待罪图功的处分。

傅作义确定反攻五原的作战决策

亚马来会议以后，各部队积极整训，士气大振，为了减少部队层次，充实战斗力，暂将部队作战单位分别各降一级，即：将师编为团，团编为营，营编为连，连编为排，排编为班等，将密藏弹枪给养补充部队。傅作义召集参谋长鲁英麟，参谋处长张副元及主管作战的参谋人员等研究反攻五原的作战决策，在研究时首先考虑到我军攻击五原，无论胜败，敌人都将增援，增援的时间可能在进攻五原的第一天晚上，最迟在第三天，这就要求我军的战役

必须在三天以内解决敌人，否则平绥、同蒲两线的敌军到来就更麻烦。第二，敌人增援的路线，可能选在乌拉特山北麓，因此路线好走，对敌安全；而日寇又在乌拉濠、乌加河架有桥梁，过桥后，即可进攻我攻城部队的侧背，因之需派一个师去破坏桥梁，把增援的敌人，阻止在乌加河北岸。第三，攻击五原要选择在黄河解冻时，使增援和被击溃的敌人受各大干渠和支渠的水隔绝，无法接应，同时土地已渐解冻，道路翻浆，敌人坦克、汽车，陷入泥淖难以行动。另外，发动群众作好准备，黄河解冻就放水浇地使敌人步兵也难以行动。

傅作义积极准备反攻五原

进攻五原的作战决策确定后，傅作义即令各队加紧夜战、巷战、村落战等的训练和演习，并亲自带着参谋人员靳书科等到各个部队指导训练，尤以对九十三团进行的掏心战术指导的最为详细。从演习中假想的许多情况，到突击受挫时的一些处理办法，都作了深刻的指示。最后傅又从其他部队中调选了一些有战

斗经验，作战奋勇的干部和士兵参加安春山团，共同组成一支精练有力的掏心突击队，以完成掏心任务。

抓紧军事配备工作：首先命令一〇一师在丰济渠口，新三十二师在协成桥以北于黄河解冻前架好军用便桥；又令驻天吉太桥接任三〇三团团长的宋海潮团密切注视黄河开冰的情况，随时报告指挥部。其次令退到伊盟桃力民的骑六军门炳岳部，于三月三日开回临河以南的南台子，德和泉地区，作攻击五原准备；令退到宁夏境内的马腾蛟师开回河套，以该师马彦旅接替丰济渠天吉太桥一〇一师防务。另一旅接替丰济渠五分子桥新三十二师防务。一〇一师与新三十二师换防后，即加紧训练作攻击五原准备。另外令各部队依自己攻击任务与侦察人员结合当地人民，详细侦察五原城内外敌人配备情况，五原外围据点伪蒙军盘踞情况，以及加速补充部队弹药给养等等。

傅作义反攻五原的战略部署及命令概要

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旬预计黄河解冻的准确

时间为三月二十日左右，大小渠道水满通流，进攻五原的时机已到。这时，由于后套人民的爱国热忱，帮助侦察，对敌情了如指掌。掏心突击队在半个月前即派出连长王步云率领精干官兵五人，沿着计划路线和潜伏地点，把地形，地物调查清楚，并伪装成敌人“宣抚队”成员，混进五原城，把城里的敌人兵力配备，司令部的位 置侦察详细。另派排长王和卿及政治指导员到鄂加地秘密组织群众，为我军带路，抬伤员，运输粮食弹药等。

三月十×日傅作义分别命令各部队，利用夜行军向五原附近推进，并限令一律于三月十九日到达各自攻击准备位置，二十日夜间开始攻击。各部队奉命后均昼伏夜行，向攻击位置前进。掏心突击队奉令后，换穿便衣，于十九日夜到达五原南和合源。该地驻有我骑兵游击队苏义和部，即冒混该部官兵潜伏下来。其它部队，亦均于十九日夜到达各自攻击准备位置：一〇一师到达五原西北四十里陈旺圪旦地区；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到达五原西云柜圪旦至什巴圪兔地区；骑六军的一部到达乃马

召地区。归李作栋指挥的游击部队有赵炽昌、刘占魁、贺德胜、张文标等部到达南茅庵一带潜伏。至此，傅作义即下达进攻命令，概要如下：

我军于三月二十日夜十二时同时开始攻击五原新、旧两城及外围据点，一举歼灭各该守敌并占领各该据点。

安春山团长为攻击五原掏心突击队司令，曹子谦团长为副司令，率队由五原东南突入城内，歼灭城内日寇司令部及其附近部队。

新三十一师（欠九十三团）附五临警备旅及山炮营由五原西面突入城关攻击旧城义和渠及西关、黑头圪旦之敌；由孙兰峰师长任总指挥，徐子珍旅长任副指挥。

新三十二师附山炮营由五原西北攻击旧城及广盛西、前后补红之敌。

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着该师三〇二团团长沙景云率领该团歼灭二财主圪旦守桥之敌。破坏桥梁，阻止敌增援部队。其余部队驱除梅令庙之敌后，向五原城及乌加河桥扩展战果。

骑六军（骑七师的一部）由胡逢泰团长指

挥（门炳岳托病请假），攻击新公中，西商的伪蒙军骑八师。

李作栋部攻击蛮可素、郝镜桥伪蒙军，成功后，转为追击部队。

王子珍旅（一个团）攻击乌拉濠、万和长守桥敌人，破坏桥梁，阻击敌人增援。

安华亭旅跃进于安北、西山咀、马七渡口等处，在敌必经的道路或地区预先埋伏，阻击敌人增援部队，和截击溃败的敌人。石玉山师攻克南牛犊后，转为追击部队。

五原战役战斗经过

1、掏心突击队的战斗经过：

掏心突击队奉命后，于三月十九日下午由和合源出发，到义和渠时，见满渠大水，五丈多宽，难以通过，但事前侦知并有人献计，可利用“锦秀堂”牛犊房屋的椽檩，架设浮桥。这个“堂”是军阀王靖国剥削人民的牛犊，有很多房屋并存有很多麻绳，掏心突击队便去拆的拆、搬的搬、架的架，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将浮桥架好，部队顺利通过。黄昏，即

向五原急进，到了南牛犊营房附近，有伪蒙军哨兵射击，我军利用渠背遮掩前进，没有理睬，哨兵也不再打枪，从此我军即以强袭的步伐向五原急进。因行军速度很快，官兵们虽汗流夹背，但为了歼灭敌人，丝毫不感到疲劳。

部队行进距城七、八里的十大股庙附近，村庄里都住着从雁北，察南调来的伪守备队。因突击队早已侦知他们的番号是一、二、三……队，与我掏心队的编号一致，因此遇到他们问口令，答以“第七队”或“第三队”并乘机捕捉了一个敌人，得到敌人的真实口令。突击队离开了十大股庙，距五原城南门仅三里，便把纵深的行军队形改为横广队形并头前进，离开道路，踏荒疾行，准备奇袭，当先头部队第一纵队到达五原城门时，敌人卫兵是两个日本兵和四个伪军，他们问口令我们答上了。他们问“干什么去？”我们答“增援”。这时我们早准备下的能手，先伏在日本兵附近，一言未了，把他杀掉；伪蒙兵当即都向我投诚，占领城门，由我军守卫。于是我军如脱缰之马，奔进城内，各向预定目标奋勇前进，从房上将手榴

弹投入日寇的住室内，全城雷动。日寇这时才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有的未穿上衣服就被炸死在床上，有的刚出来，就被我官兵以刺刀、手榴弹杀死。激战了半夜，占领了实验小学，粮仓库，屯垦合作社弹药库，皮毛店日寇司令部，谭统领公馆，直鲁豫公馆、耶稣堂、天主堂等七个大据点，只剩屯垦办事处和平市官钱局两处。这时东方发亮，日飞机飞临上空，低空盘旋。因我军占领据点后没有扯下太阳旗，敌机分辨不清，没有投弹，反而把炸弹投向增援的伪军守备队，把他们炸散。

义和渠以东的日寇伪军，至此已大部被消灭，其余多逃往屯垦办事处及平市官钱局两个据点。团长曹子谦攻击平市官钱局，营长阎梦云率部攻击敌人司令部。因其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战况惨烈，阎梦云头部中弹阵亡，攻势仍不稍衰。安春山又令营长刘惠发进击，时已上午八时，敌机又来了十余架，飞的更低，先向城外四周我攻城部队投弹，逐渐向日寇残留的据点周围民房投弹，接着一部分日本兵，由屯垦办事处端着刺刀出来反攻，被我官兵以手榴

弹打回。安春山腿部受伤，突击队由副司令曹子谦指挥，当时我军用轻兵器攻击坚固据点。困难不少，日寇又顽强死守，虽我官兵奋不顾身，反复冲杀达五、六次，终未攻克。直到三月二十一日午后，新三十一师部队同突击队会师在一起，傅作义又派参谋人员率炮兵第三营赶来，在步炮兵协同攻击，延至二十二日下午，才将两个据点日寇消灭，至此全部攻克了五原城。

五原西关和旧城等据点的战斗经过，在掏心突击队进攻五原新城的同时，新三十一师（欠九十三团）附五临警备旅贾世海团，由五原城西进攻西关和黑头圪旦两个重要据点，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障碍物，以炽盛火力，阻止我军进攻。我军官兵用黄色炸药爆破院落墙壁，反复冲击，直到二十一日早晨，才将该两据点完全占领。团长贾世海阵亡，官兵伤亡亦众，但士气旺盛，仍继续进击义和渠以西敌人，于二十一日午后将该地区敌人肃清。此时，仅有残留在平市官钱局和屯垦办事处两个坚固据点的日寇，既不逃走亦不缴械，顽

强抵抗，敌机九架分两批，每批六架轮流在空中轰炸扫射使我军接敌困难，屡攻不克。傅作义最后又派靳书科参谋率配属一〇一师的炮兵营，并由新三十一师派郁传义联合发起进攻，终被我全部歼灭。

新三十二师于三月二十日夜二时，由五原西北方开始攻击，以九十四附九十五团赵寿江营进攻五原旧城及前后补红；以九十五团（欠赵寿江营）进攻广盛西，驻该地区伪蒙军一个骑兵师，利用院落及坚固工事，障碍物，以轻重机枪火力，构成密集火网，向我攻击部队集中射击。我官兵在平坦开阔地形，奋勇进攻，前仆后继，伤亡甚重，至三月二十一日晨，虽将前后补红敌人击溃，压迫其退入旧城内，但营长赵寿江阵亡，全营官兵仅剩七名。九十四团苗逢安营的攻势因之顿挫。这时傅作义唯恐攻城失败，派参谋靳书科前往督战，发现苗营顿挫情况，向傅报告后，傅命将苗就地正法。经过董其武，袁庆荣两师长保证，允苗带罪图功，继续攻城，苗才得幸免。

九十五团（欠赵寿江营）由西边攻击广盛

西，同样是在平坦开阔地形下前进，伤亡亦重，营长杨廷璧被敌机枪打断胳膊，抬下战场，任双其营伤亡尤重。在二十日夜间，位于王二马庄的总预备队三〇三团团长沙海潮，自动派第八连由广盛西东边协同进攻，亦受到敌人机关枪四面扫射，伤亡殆尽，连长张步青阵亡。一直到二十一日中午，我攻城炮兵向广盛西敌人展开炮击，宋海潮又率全团进击，敌人不支才向东溃退。这时五原旧城敌人看见广盛西敌人溃退，陷入孤立，亦在我猛烈攻击下，向东溃退。九十四团遂占领五原旧城，此役我军官兵伤亡甚多，师长袁庆荣亦受伤。

攻击外围据点的战斗经过

骑六军的一部骑七师于三月二十日夜由乃马召向新公中进攻，守敌伪蒙军第八师顽强抵抗，战斗了一日，呈胶着状态。二十一日晚间，该军一部在原地佯攻，调转主力到新公中以东灶火渠畔，分头向新公中、西商猛烈攻击。敌人不支，以无线电向五原日酋求援，此时日军司令部已被我掏心突击队歼灭，该电被

傅作义的电台收到译出，便以五原日酋名义复去一电，大意是：“五原无援可增，可自由行动”。伪八师奉电后，即向东南溃退。

李作栋部于三月二十日夜，由南茅庵攻击郝镜桥，蛮可素。守敌伪蒙军和绥西联军王英部，战斗力不强，又以五原各重要据点均被我围攻，已成火海，丧失斗志，稍事抵抗，即向南溃退，李作栋部尾追，至此外围据点的敌人已全被击溃。

打援部队的战斗经过

一〇一师在当时除担负总预备队支援各战场外，其三〇二团担任攻击乌加河二财主圪旦守桥敌人（系伪蒙军，约一个团）和破坏桥梁，阻止敌人增援。该团于二十日夜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后，即把主力放在桥南，另派部分队伍由郭碾房用船渡过河北，两面夹攻，很顺利的将守桥敌人击溃，俘虏多人，随着将桥梁破坏。同时，新六旅于二十日拂晓前，将乌拉濠、万和长附近的桥梁、伪军守备队击溃，并破坏了

桥梁。

随着战斗情况的变化，五原旧城已于二十一日下午攻克，傅作义即将三十二师改为预备队，由师长董其武率三〇一、三〇二两个团到二财主圪旦桥南阻止敌人。

这时敌人增援部队汽车八十余辆，二十一日晨到达万和长，因桥梁破坏，不能前进。当日午后大举进攻，新六旅不支退往北山畔，敌人即架浮桥过河，并强修乌加河桥。我一〇一师三〇一团，三〇二团，此时开到，即以三〇一团为预备队，以三〇二团，三〇三团合力击敌，敌人退到折桂乡，每日以炽烈的炮火与我军隔河作战，终因我军在桥南占有八字形桥头堡阵地，以火力封锁桥梁，使敌人不能修桥过河，郭景云团长受伤，师长董其武即令团长宋海潮负防止敌人修桥渡河的全责。宋选拔最优秀的轻重机关枪手于贵林等多人，对桥梁构成密集火网，敌虽昼夜更番攻击，终未得逞。至二十二日下午我攻克五原城的部队已肃清了五原旧城的敌人，收复了外围各据点，完成了阻敌增援任务。

在这一整个战斗过程中，由于掏心突击队捣毁了敌人的司令部，使各处的敌伪部队，失去了首脑的指挥作用，陷于瘫痪，便在我各部队紧密配合围攻之下，完全陷入崩溃，从而四处逃窜。敌逃窜时，一方面受我游击军安华亭截击；一方面又因后套各村人民痛恨日伪军残暴行为，认为敌人溃退，是报仇机会，便到处捕杀。这样敌人陷于前有截兵，后有追兵，四面楚歌境地，不敢进村，不得不离开道路，落荒而逃。但由于攻击时期，正值冰解河开，不仅南是黄河，北是乌加河，东是乌梁素海，西是丰济渠，不能徒步渡过。而且由于后套的耕地到处浇满了水，春季冰解地开，土地翻浆，人马陷入不能自拔，因此所有溃退的日伪军，除一部分伪蒙军窜到西山咀退水渠，拼死命用绳索拉过一些外，其余或被我军击毙和俘虏，或被当地人民捕捉和砍杀。即敌酋水川伊夫中将，也没有免于死亡。原来，水川伊夫从五原逃离后，率数十骑兵逃至乌梁素海附近的四柜圪旦，企图渡河到大余太，被我游击部队连长张汉三，佯称伪安北保卫队，愿为他带路

东行，待诱至“二驴子湾”，伏兵四起，全被歼灭，砍下水川头颅，缴获了他的祖传战刀及枪弹、马匹、财物等。但伪绥西联军头子王英却走脱了，这是由于截击部队旅长安华亭，原系王英旧部，王英被困在西山咀后，安华亭不分敌我，顾念旧情，撤除守桥部队，把王英等放走。

在日伪军溃退时，我军追击堵截，所获汽车，枪炮，弹药，器材等甚多。仅安华亭一个旅，就缴获各种枪一千多支。

日寇派部队收尸

在这一战役中，绥包敌人既不能增援于五原失守之前，解救围困，失守之后又未能将尸体收回，尤以水川伊夫中将下落不明，责任重大，便不得不派遣大部队围攻五原，企图将敌尸收回。三月二十四日攻五原敌人大部队密集乌加河畔，以数十门大炮向茅庵子圪旦三〇一团阵地轰击，并以飞机十余架配合轰炸射击，掩护敌步兵乘橡皮船渡河。我三〇一团官兵浴血抗击，伤亡惨重，营长冯增波、连长郭宝瑞

等阵亡，团长王建业臂部受伤。敌乘势渡河，并迂迴我三〇三团背后，从桥后夺占桥梁，攻势极为猛烈。团长宋海潮身中七弹，洞穿大肠，昏死在阵地，随从人员大部牺牲。此时傅作义认为攻击五原已获成功，阻止敌人已无必要，命令全部主力向后转移。在一〇一师转移时，情况紧急未能将宋海潮尸体掩埋，暂寄于渠濠之内。当天午夜，宋苏醒过来，看见满天星斗，周围寂无人声，但因流血过多，手足冻坏，不能行动。两天以后，老乡刘大宽，郭四毛旦发现宋尚有气，才抬回村内休养，得以生还。

敌人占据桥梁后，强行修复渡河，一部前进到五原城内外搜尸。但经过多日战斗和我坚壁清野，已成瓦砾一片，敌尸因火烧，狗吃，难以全数寻获。而敌占期间的汉奸全喜亭、刘子俊、杜风山等，被我全部处死，这时我突击小组部队，又不时夜袭，敌人心存畏惧，便把找得部分敌尸，焚化装灰，逃出后套，五原战役便告结束。

一九六四年五月

五原战役的片断回忆

刘会友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率三十五军由山西河曲、偏关一带，转战绥远、陕坝、五原、临河等地整训。当时三十五军有：直属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骑四师，还有友军骑七师，（民称：铁帽兵）。其次还有杂牌军三个旅。

一九三九年冬季袭击包头，新三十一师九十三团攻进包头城（当时我任该团营长），占领了财神庙街，激战一昼夜因援军迟到，奉命撤出包头城。这次战斗我军伤亡较大，返回河套整训，补充兵员。

一九四〇年占领包头敌人司令官小岛（日本人），与日本鬼子水川中将率日寇第△师团和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入侵河套的五原、临河、陕坝、头道桥等地。傅作义采取避战措施，把主力隐蔽起来。敌人因不见三十五军的

踪影，随即逐步由陕坝、二道桥（杨柜）、上下蛮会、新堂等退至五原屯居。敌人由乌不浪口进入后套时，我团正在乌镇西北包盖图及其附近等地，接到命令：避不利，找胜利，化整为零，向南转移，准备过黄河。

这时，日寇锐气正在旺盛，连夜迂迴乌不浪口，向西追击马鸿滨的先遣部队骑兵旅。夜间敌人由北山下大路向西前进时，我将机枪连交给团里集中，我率三营七、八、九三个步兵连，一百二十余人，准备伏击敌人。将部队部署于大路南侧，敌人正在前进中，我们出其不意打响了战斗，击毁敌人汽车八辆，击毙敌人二十三名，缴获步枪二十支。因联络器材少，八连排长郑满宏率领一个排登上北山，与我失去联络，我心中又急，又难过。虽然派联络兵赴北山找寻，未能找到。当夜奉命转移临河西藉亥滩停止待命。次日天明，日寇五人乘一辆汽车来到藉亥滩小沙沟东岸停止，锯倒一根电线杆，正在折截电线时，我派九连崔排长率兵攻击敌车，因行动迟缓，使敌人逃回临河，此次伏击战未有收获。

一九四〇年三月间，义和渠流经五原县城的一条大渠冻冰已开，八战区副长官部为进攻五原召开了军事会议，我记得傅作义讲话很简单：“攻必克、守必固，违者军法从事”。接着就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问题，尽量提出，予以解决”。傅说：“我向你们要求两个字：“胜利”！就散会了。之后我团组成突击队，共分八队，团长安春山任司令，我任七队队长。具体任务：“实行打进去，掏心战”。是这样分工的：屯垦队攻打五原西门外广盛西之敌——伪蒙军；第五突击队阎乃铎攻打合作社之敌；第六突击队攻打实验小学之敌；我的任务是带领预备队，待天将夜静，部队开始行动。我奉命为尖兵连，先行通过义河渠浮桥后，沿着敌伪蒙军驻地空隙间通过，到达五原东农林试验场，掩护各突击队展开，进入攻击位置。时间：夜间十二点（零点）发起攻击。天拂晓，攻击合作社的突击队与攻击实验小学的突击队夜袭成功，完全占领了据点，消灭日本鬼子三四十人。其余的敌人退到屯垦办事处，五原银行，

坚守据点待援。

我队在农林试验场南小渠壕内展开，准备截击敌增援部队。于夜间三时许，住南牛犊的敌人一个大队来增援了，距我们约百米附近，四路纵队向前进，乱嚷乱吵，被我们发觉。我们的哨兵一问口令，敌队长将他的队伍停在大路上，派他的护兵手持三八式步枪来我处联络。我对他说：“中国队伍已攻进城内，我队退出城外待援，你回去叫你队长来我处商议如何反攻。”该敌护兵将要返回时，我叫他：“将枪放下，速请你们队长来商议！”该兵将枪交与我，向回走去。这时我将部队部署在渠壕，面向敌人。敌人四路纵队停止在大路上，坐着休息。我令崔排长将三个排轻机枪共九挺对准敌人，待我枪响，就开始对敌射击。时间不大，敌人队长李三毛旦与护兵来我处。该李距我十米左右，就喊哪个是队长，一连叫了几声，我见他手里拿的手枪，张着机头，我恐怕吃亏未答应。待该敌来到渠背上，我将枪一举说：“我就是！”同时发弹，只见李三毛旦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不再出气了。他

的护兵两手将我拿的枪抓住了前半部。我叫他放下手别动，他仍然不放手，我向渠堦一跳，站在高处，该兵到了渠壕里；我居高临下将枪把一扬又击准了，打在他的头上，该兵死亡了。这时崔排长指挥机枪手开始射击，击毙敌人十二名，缴获步枪十三支，其余的敌人都逃跑了。

次日上午八时，敌人乘汽车一辆，由西南方向而来，到南门外，被我察觉后，（距离约千米），用轻机枪射击一梭子弹（二十五粒），以纵、横扫射，打毁了敌车；车上的敌人争相逃窜，被我军阻击部队俘虏了。

上午九时，号长用号音调我们进城见了司令安春山，他命我率全队攻击屯垦办事处驻的日寇。该院东南筑有砖碉堡，能封锁东西南北马路。巷战时我们以分兵两路合围的战法去攻击该敌。命第七连李得胜在马路西边向北攻击该敌“屯垦办事处”正面，以云梯翻墙头进院，消灭敌人。以第九连杨思万为右翼队，在马路东攻击前进。我率第八连为预备队，在第九连后跟进。巷战时，穿墙越院，接近了敌办事处

院，第七连战友扒墙时，从云梯扒上墙去，不忙下跳，露着半截身子，睽视敌人，被敌人杀伤二十多人；跌下云梯，摔在墙围外边。我命李连长留下少数人牵制敌人；以大部向西北迂回包围办事处之敌。这时天到下午六时，担架队将受伤的战友抬到绷带所去换药、治疗；把阵亡战友也运到后方合作社大院里。第九连全部占领了办事处路东各院落，与敌对峙；我命杨连长亲自指挥爆破组，炸敌人碉堡；并在大门北面围墙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冲击。我率第八连全部将屯垦办事处包围。将办事处外围房屋完全占领，使敌无法逃走，不使漏网一个。激战一天未打进去，我队伤亡二十三名。激励士气的战斗口号：坚决打进去，消灭日本鬼子！给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友报仇！……。夜袭，由西面围墙突破口处攻进院内。敌人放了催泪性和喷嚏性的毒瓦斯两枚，我们因没有防毒面具，迫使退出该院，停止了攻击。但仍然与敌对峙着。

次日天明，通讯连与我架通电话，我要求炮兵掩护我队突击。第一发炮弹落到屯垦办事

处东北，超过一百五十米，以电话告知了炮兵杨连长。第二发炮弹，打在办事处院内，我以电话告诉他打中了目标，请继续发射燃烧弹四发。我就发起了冲锋，突击排用云梯扒墙进了院。我见战士太笨，行动迟缓，我手持一把大刀翻过墙头向下一跳，未防，被敌指挥官一战刀砍来，我已躲不及，被敌将左手砍破。我以大刀向敌头上砍去，这时，我们的战士跳进院子数人，正与敌白刃战，我紧喊抓活的，战友们都眼红了，哪听这一套，你一刺刀，我一刺刀，挑死日寇十一名，军官一员，其余敌人由西墙破口向北逃窜。正追击时到了大街十字路口，我师九十二团团长郁傅义，指挥他的部队由西边五原银行方向追击上来（尾追败退之敌），与他协同后，我回屯垦办事处整顿部队，停止待命。是役清扫战场，缴获手枪五支，步枪十二支，毒瓦斯（臭弹）四十枚，战刀一把，迫击炮一门，电话总机、电话机等物资，还有载重车一辆。

城内战斗结束后，我军又攻打五原西新公中之敌，敌伪蒙军全部被俘。次日奉命转进五

原西北梅令庙附近停止待命。休息一夜，天明奉命到了五原陈旺圪旦村整顿、休息、待命。

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励下，在河套人民，特别是五原县人民的配合与积极支持下，收复五原的战斗，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全部干净地消灭了侵入五原县的日本鬼子和伪蒙军队。

此次收复五原，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如下：

一、我师九十一团、九十二团、与我九十三团组成突击队，由新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指挥攻打五原之敌。屯垦队的两个营攻击五原新城西门外广盛西之敌。

二、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指挥他所属的部队，攻击五原旧城之敌。

三、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率其全部，在乌加河南岸截击由包头、安北敌人之增援部队。同时消灭五原溃退的敌人。

四、骑四师师长石玉山率全部埋伏在西山咀以西各村庄，堵截敌增援部队；并追剿溃退逃窜的日伪蒙军。安华亭旅坚守西山咀桥梁，阻击敌增援部队。

五、骑七师师长门炳岳率所属一部攻打新公中之敌。（蒙伪军第八师李守信的伪蒙军一部分。）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日寇飞机轰炸五原

王兴亚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攻陷了归绥和包头。一九三八年冬，蒋介石由重庆前往陕西武功亲自主持军事会议，会议期间，蒋介石作出决定，升任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在绥西五原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当时我在长官部军警宪督察处派任临河督察分处处长。

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我来五原总处开会，住在长官部军法处内（军法处座落在五原东街平康里一个大院）。十日近午，突然听得东方传来隆隆的马达声，倾刻之间，黑压压的一群飞机已飞临五原上空。由于飞得很低，机翼上的日本国徽和飞机腹部悬挂着的炸弹都清晰可见。只见日机共有二十八架，分为三列，一列三组，一组三架。另有一架单独飞在右侧前方，由飞机的数目可知是一个轰炸机大队。

在一阵很长的警报声中，日机的炸弹带着尖锐的啸声，纷纷向五原城内倾泻。那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顿见市内尘烟四起，遮天蔽日。敌机在一阵狂轰滥炸后，立即拨头向东方飞去。

敌机飞走后，我立即跑步进入街市，这时城里烟尘未息，烟药味，血腥味，混杂在一起，使人窒息。其时街上已有大批的军警实行戒严。禁止行人，分组沿街挨户，依次检查，我也参加在组内指挥清查工作。

经我亲眼目睹的有一个年约六旬开外的老人，被炸死在街中心，仰面屈膝，倒在血泊中。胸部被炸有如小洗脸盆大小的一个深洞，五脏六腑，都炸得没有了。有一个尸体脑袋被炸飞了。有的半截身子不见了，有的重伤缺臂断腿尚在呻吟，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只见死者附近的树上、墙壁上，沾染着红的鲜血，白的脑浆，黑的头发，和一缕缕颜色不一的烂布条。有的产妇和乳儿，被炸死在屋内。另外，还有进入防空洞内被炸起的尘土堵塞洞口而死者，满城的呻吟声、呼叫声、哭嚎声。实使人

悲不忍睹。

在日机轰炸的时候，傅作义正在他长官部的院中，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附近三五米处爆炸，他被身旁的一个卫士推倒，那个卫士身负重伤。傅本人虽然没有被炸着，但是也被尺许的黄土掩埋了他的全身。

经过详细的检查统计：居民被炸死二十余名，炸伤三十余名（重伤多于轻伤），军人炸死一人，负重伤的五人，城镇居民郭二不浪一家十口人，只有三口（三代）人，幸免于难，其余七口都被炸死。另外尚有居民木匠赵明家，有九人躺在院里山药窖内（他的父母二人，徒弟四人，老师傅一人，做饭的一人，邻居一人）。一颗炸弹在他院中投下，窖口被炸弹揭起来的黄土堵塞，等到飞机飞走以后，被刨出时，这九个人都已被闷死在窖内。炸毁房屋约四五十间，财物的损失，难以估计。

经长官部指定善后处理办法，对伤亡的军民，炸死者发给埋葬费，炸伤者按轻重情形分别运往当地医院和长官部军医处、兵站医院治疗。对房屋和损失的财物，由督察处派人会同

当地政府按户清查，按损失的大小情形，予以适当的补助、救济。对于无人抚养的孤儿送交育婴堂，对老残鳏寡无人瞻养的，由当地政府予以妥善的安置。

此次发生空袭伤亡事件，绥远省防空司令部，应负重大责任，各要路口，都设立了防空情报哨所，敌机经过该哨所管区都没有发觉，使五原不能及时的发出空袭警报，而遭到这次不应有的伤亡。经查明责任，长官部通令并布告，着将绥远省防空司令兼长官部军警宪督察处长张公量撤销本兼各职，并调换驻西山咀的防空情报哨所人员，该所三名情报工作员，交由长官部军法处，按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理。

(五原县政协供稿)

解放前陕坝的商业概况

孟传志

陕坝是我们伟大祖国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城镇。解放前隶属于绥远省，是绥西行署的所在地。那时陕坝全名称是绥远省陕坝市政筹备处，处长是常佩三。四七年陈国桢任绥西行署专员，兼陕坝市政筹备处长。在四五年以前，抗日战争时期，陕坝是绥远省省府所在地，又是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绥远省迁来陕坝是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战争的第三年，省政府于一九三九年春由榆林迁陕坝。三九年以前陕坝仅是临河县的一个区——第三区。绥远省府迁来后，陕坝设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大厅，和长官部、副官处、军需处、督察处、宪兵司令部等八大处。那时陕坝城镇虽小，但党、政、军、警、宪等机关林立，商业户亦随之逐渐增多。现将一九三九

——一九四九年商业户数、行业分布网点、经营规模简述如下，因年深日久，回忆可能有失实之处，仅供参考。

一、陕坝镇容及主要街道

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陕坝镇有土城，城内面积很小。中心点是小转盘（即糖业公司五门市），北至天主堂（即现在的工程队），南至房产，西至兽医站，东至大转盘，东、西、南、北都有城门。主要街道有四条：东西大街两条，南北大街也有两条。东西大街第一条即小转盘以东以西；第二条即天主堂门前，现在的医药公司批发部往东。南北大街横贯小转盘南北为第一条，小转盘以西现在小五金厂以南以北为第二条。商业区以小转盘为中心，向南到铁匠巷，即现在粮食局一门市部略往南，向北到天主堂现在工程队略往南，向西到现在食品门市部，向东到现在百货公司新兴商店。

二、商业网点分布

东西第一条大街上的商业，多以经营百、杂货、棉布为主。东西大街第二条的商号，

多是饮食及编织、剧院、澡塘等服务行业。南北大街第一道街的商号主要经营糕点、烟酒、副食、杂货。第二条南北街商业主要经营车马挽具、皮件绳线，个别饭馆也有开设在此街上的。

三、经营的行业

商业方面有：百货、棉布、副食杂货业、糕点酱园业、五金颜料业、饮食旅店理发业、粮油加工业、文具书籍业、医药、照相、镶牙业、钟表修理业等共九大业。此外还有货栈、剧院、刻字等商号，虽然家数不多，但都各占一席，有相当地位。手工业方面有：木器厂、毡坊、地毯房、编织席芭坊、酿酒厂、缝纫社、鞋业社、织造业、铁器铸造及红炉业。

商业、手工业统一由陕坝商会领导。（到四六年手工业另立手工业联合会）。商会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初成立时，总商会设在临河，陕坝商会是支会。那时商业户数寥寥无几（仅百十户）。到一九三九年以后陕坝商业随着绥远省府迁来，户数大增，远远超过临河，此时的陕坝已成为市政筹备处，商会也随之成为市级

商会，不再归临河商会领导。大的行业，如百货、棉布业、副食杂货业、饮食服务业等都有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归陕坝商会领导，是商会有一个基层单位。

除了上述商业、手工业外，还有一个摊贩业。摊贩业的营业地点：三九年前在大街两旁，三九年至四五年绥远省府迁来后，为了整顿市容，给摊贩划定营业市场，把所有摊贩都集中到现在的经委以西，粮食一门市的房后营业，那时上述地点是大空场，无有住户。摊贩业在四五年成立了同业公会，也归商会领导。

四、商业户数及经营方式

陕坝商业有座商、行商、摊贩三类。座商是指有门市的商号。这类商号三九年前约有百十户，三九年——四五年增加到260余户。行商指专搞长途贩运，他们与货栈相连接，不占据门市者，约有5户左右。

摊贩：分挑贩和摊贩两类。挑贩是指无固定营业点，他们营业方式是串街、走巷、下乡流动售货，此类约有80人左右。

摊贩是有固定营业场所，但没有门市铺

面，而经营方式是摆地摊，他们是早摆、晚收、夜归家。此类约有200户左右。

手工业者约有100余户，他们是手工生产方式，产品大部分由商号给推销，少数的厂也有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来经营。如木器厂、鞋业厂、铁器、红炉等都是采取自产自销兼批发的经营方式。这些厂规模都不大，最大的厂也不超过十人。大多数的厂，厂主就是师傅，代两三个徒弟来经营。所以陕坝的手工业厂，大都是师徒关系。

这里再谈谈主要座商的户数及经营规模。主要座商有：棉布百货业的万利和、中兴号、万祥号、复圣隆、宝衣隆、信义成、福星久、福星瑞、民生商店、同义隆、大昌商店、正昌合。

副食杂货有：万盖德、信义生、信义久、成城商店。

糕点酿造有：蚨来号、源祥号、玉记、庆和瑞、恒玉兴、万享利、义生泉。

中西药业有：兴亚大药房、雷克斯大药房、美利斯药房、福生堂、义生堂、复生永、

复兴永。

饭庄旅店业有：恒玉永、信德饭庄、同兴饭庄、利民旅店、四海车马店。

货栈兼行商有：义合诚、永记、宏祥栈。

粮油加工店有：信德堂、永记粮店、徐成粮油店、信和源、普爱堂粮油加工店。

官商有：绥远省贸易公司，经营棉、百、杂，主要批发，归绥远省物资管理处来领导。

上述各户都是各业中的较大商户。但这些所谓较大的商户，他们每户的职工也很少超过10人，（饭庄例外），资金每户超过一千元银洋的也很少。当然也有个别商号资金较大，人员较多，经营规模宽、广。如棉布、百货业的首户万利和，资金约在五千元银洋以上，经理叫刘丹岫（已死），店员约有15人。营业地点：在陕坝市中心小转盘西南角，五间门市，陕坝是他的总店，临河有分号，北京派有专人长住采购商品。经营方式：既零售、又批发。经营品种，上至绸缎、布匹，下至针线纽扣、小百货、化妆品。进货渠道：远至上海、北京、苏杭州，销售地区不仅河套全区，

而且通过边商运销到农牧区、外省、宁夏一些县，经营规模可谓宏大。另一个较大商号是万盖德，该商号以经销纸烟为主，兼营棉布、百货，他的资金较雄厚，也在五千元银洋以上。人员超过15人。经理是冯寿青（已死）。该商号与其他商号不同点有二个方面，其一是资金来源，是股东投资。即东家投资人不参加商店工作。经理是由东家另外聘请，经理不是重要投资人。其二是万盖德经销纸烟有专利权（哈德门牌英、美烟）。与外商买办签订合同，买办供货，按本核算，销货后付款。这种经营方式叫“销经理”。由于这两个不同点，所以万盖德商号在陕坝市场上就具有更大的竞争能力，由于经理不是“铁饭碗”，所以工作更负责。该号在经营中采取了深购、远销的方法。所以，商品齐全既物美又价廉，再加经销纸烟，更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以经营糕点、酱园、海味为主、兼营杂货、副食的较大商号为蚨来号，该号营业地址，在现粮食一门市，该号资金二千元左右，人员约15人。资金虽不如上述两家雄厚，但在

同行中应为首户。经理是陈汝明（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的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厂。后边的厂子生产糕点、双醋、酱油、酱菜。他在山西太原聘请著名糕点师傅王学礼，在河北省保定市聘请槐茂酱园老师傅苑木安，并派有专人驻北京、天津采购正兴德茶庄花茶和天津著名海味店海味。他的最著名产品是八宝酱菜，生产时完全采用保定名酱园槐茂酱园技术。原料有花生米、杏仁、地娄、藕片等许多当地没有的细菜。八宝菜完全用甜面酱腌制，甜面酱不仅原料是好的小麦面，而且是久经夏季的伏酱。八宝菜酱腌成品，颜色紫红透明，气味甜脆清香，产品包装用红柳编制小篓。篓的内面用牛皮纸，刷过牛血晾干后，裱糊。真是既干净、又牢固，而且保持菜质不变，此篓分一、二、三斤容量，用此包装，馈送亲友，旅途携带非常方便。再加上美丽的货笈，更是醒目大方。八宝菜不仅绥远驰名，而且运销宁夏、伊盟一带。记得宁夏银行李行长经常派专人来采购此菜。年销此菜在2万斤以上，每斤价24元。蚨来号于一九二〇年开业到一九四九

年歇业，经营三十年之久，在社会上树立了较好的信誉，积累资金万元以上。其歇业原因有二：一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四九年不愿放下屠刀，傅作义将军起义了，但反动派一小撮却逃到绥西陕坝，残酷的搜刮民财，压榨群众。他们不仅巧立名目向商号摊派军马费、壮丁费、给养费，而且纵容败兵、游勇抓经理、请财神，这种明抢、暗夺、苛捐杂税，使得蚨来号在四九年头二、三个月中应差摊款高达六千余元，逼得经理远走北京，店员四散，商号歇业，这是主要原因。四九年，上述主要商号都受此害，所以解放后旧商号无一家存在，实是受反动派摧残不起的原因：蚨来号歇业另一个原因是经理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国民党经常宣传“谁有钱，谁就是革命的对象”，“商人就是敌人”。他受蒙蔽较深，对共产党心存“怕”字。怕共产党没收他的企业，所以在即将解放的四九年仓促歇业，商号的固定财产，及一时难于变卖之酱、菜，作价留给原来蚨来号的店员，作为五〇年开设群力斋酱园入股资金。

俗语云：“家有家规，店有店规”，陕坝各商号虽然都是私商，而且规模不大，但每家都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办法和店规、店训。店规包括用人、考勤、戒条、奖惩、福利等等。

店训：属于格言性。如每个职工都应爱店如家，店大家大，店肥家肥，每个职工都应恭敬待人，勤俭办店。并有做事做得自己事、敬人敬得自己身的警句。

店规：凡进店的职工，都需有铺保两家。店员进店，考核三个月，学徒进店试习三年，三年期满再订工资待遇。一般的是学徒三年期满后，月工资20元（合现在人民币数）学徒期间无工资。根据学徒本人表现，每年正月初六日，发表每个职工和学徒工一年来考核情况，然后公布此年应偿给学徒若干钱。考核不好者，当场辞退，交给介绍人领回。考勤制度规定，职工进店后不享受休息日，有事可请假，直系亲属的婚、丧、嫁、娶准假半月（途中日期除外），超过半月无工资，超过三个月开除，正式职工五年以上工龄者，假期可以加倍享受，学徒二三年一回家，假期一个月。一年

三考勤，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为评论职工优、差日，对优者可随时提工资，一贯优者可顶生意（即参加商店年终分红利），差者随时可解雇。

戒律：各商店都有戒规。如蚨来号规定店员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留长发，不准赌钱。服装要一律穿大褂，不准带家眷，福利待遇很少，只是享受医药费、洗理费每月一次，再者店员自用店内商品，可以按进货价算钱。

各商号资金虽少，但搞得很活。这些商店的共同做法是：

1、人尽其才，无才者不用，工作不出力的解雇。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的原因是奖惩及时。工资待遇一年可以三调整。一年分三个节日算账，算账时即可调整工资，优良提升，差的下降，屡差者解雇（职工自愿离店也可以）。

2、货畅其流，商店很少积压，其措施是：①以质论价，商品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市场余、缺，价格可以随时调整。②进货以销定进，看准市场需求变化组织货源。各商店经理

都担当观察商情的重任。③销货方法灵活，如延长营业时间，黎明即营业，夜半始收市，营业时间每日长达18个小时之多。服务态度好，销货员工作原则是：“顾客常有理”五个字。本着“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精神接待顾客。真正做到了顾客来有迎声，走有送声，接待顾客时“百拿不厌，百问不烦”。使顾客高兴来，满意去。服务质量高，销货员普遍能做到买一介绍三，帮助顾客挑选适意商品。算账快，唱收唱付货款，不出差错事故。包装商品既美观，又牢固。俗语云“货卖一张皮”。商品包装漂亮也是能扩大销货额的主要原因。送货上门，方便顾客，购货不拘数量多少，不论路途远近，不管天气好坏，都能做到按顾客要求及时送货。此外，在销货中还采取赊销、代销、期款、发购货卷预约购货等等方式，招徕顾客，扩大销售。

3、各商号经营中的经验和教训。经验概括如下几字：即组织商品要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价格低，你低我到四处卖。教训是：内怕长支（即店内人挪用资金），外怕

欠（怕欠款收不回来），最怕积压不周转（商品存库过大），失去信用就全完。所以正当商业都非常注意信用。

解放前陕坝都是私营商业，他们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经营原则是“无利不干”。所以各商店对职工都存在着工作量太苛，福利待遇很差的剥削行为。工人工作无保障，常存在失业危险。另外各商店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他们在市场上操纵物价，投机倒把，同业之间，不断发生“大鱼吃小鱼”之惨剧。所以旧社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他们的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经营灵活是表面现象，掩盖不了私商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丑恶面目。我们应本着毛主席的教导，在辩证的、历史的看问题中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吸收他们经营中的好方法。对私商唯利是图的本质要批判。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我在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的十年

韩葆口述 哈日夫翻译

罗布生那木吉拉 王伟强整理

(一)

历史上的乌拉特中公旗是乌兰察布草原的一角。这里地域辽阔，水草丰美，牛羊遍野，盛产的畜产品远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历来就为内地商人所垂青。“七、七”事变前有同义隆、万国长、四义堂、富国喜、义和洲、万合春、乌拉干道布、杭哈（河套）、大升等买卖市场。当时中公旗经济对外的依赖性很大，绝大部分粮食、生活日用品，都依靠内地供给，因而北京、山西、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的大商号与这里的官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任意哄抬物价，敲诈勒索，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日趋贫困。而大商号则通过做牲畜、绒毛生意，发了楞财。包头的

富国兴分销商大掌柜贾斌（外号“灾病”），就是靠在这里做买卖爆发起来的；三十年代后期他家牲畜存栏数就达到五千多头（只）。“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绥包，对这里实行经济封锁，许多大的商号停止在此地的商业活动，接着是大量的边商涌了进来。一九三九年一年就来了一百六十多户，仅喇嘛居占一处（方圆二十里的夏营盘倒场地）就来了六十多户。不久，日寇的黑手也伸了进来。他们所控制的大门公司、畜产品公司，对牧区的经济掠夺日甚一日。真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牲畜、绒毛大幅度降价，生活日用品大幅度涨价。连当地王公贵族的经济利益也遭到损害。有一次旗扎萨克仁亲僧格二千斤驼绒为求一买主，到处碰壁，很长时间卖不出去。而生活日用品之昂贵则达到惊人程度。举例说，当时八十斤绵羊毛，或五十斤驼毛，或二十斤山羊绒，只换回一块衣料（十六尺）；一只羯绵羊换一包生烟（一市斤）；一峰骆驼换一块缎子（十八尺）；一条牛换一双马靴；一匹马换八十斤面粉，如此等等。

此外，这里那时还流行两种高利贷剥削形

式：一种叫做“喝茶”，就是有些有牲畜的人家，常常从买卖人的手上赊销商品，日久天长，本息翻番，弄得债台高筑，即使把全部牲畜抵押出去，也不够还清历年的欠帐，甚至弄得倾家荡产。另一种叫做“德斯”，就是买卖人收购牲畜时，只先付给牧民适当比例的现金，其余大部分以盖有△（五元）×（十元）、○（一百元）戳记的收据顶货币发给卖主。以后若遇货币贬值或单据丢失，或找不到买主，便等于把牲畜白白送给了他们。日寇的经济封锁和掠夺，边商的剥削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广大牧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形容自己当时的境况是“断炊烟，背讨吃饭袋的穷鬼。”

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摆脱经济上依附外来实力的被动局面，旗衙门曾多次设想自己搞商业、做买卖，但由于意见不统一，搁置了好长时间。直到一九四〇年在扎萨克仁亲僧格、协理巴图毕力格、都统齐伯格扎布和我的力主下，才于一九四一年春旗衙门开印集会上、并报请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同意，批准了成立“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以下简

称合作社)的方案。从此,乌拉特中公旗的商业结构,增加了一种组织形式——合作经济组织。

(二)

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社址设在川井(当时旗政府所在地)。由巴图毕力格协理主管,衙门都统齐伯格扎布任理事,我和梅林章京格瓦顿楚格任副理事。还从衙门抽调六名秘书苏德那木、巴图苏和、塔斯阿迪亚、敖氏朝克、齐鲁、吐布吉日嘎拉等当职员。苏德那木和巴图苏和两人任总秘书,管旗章京那仁兼管合作社监查工作。除此还招聘了一些职员和工人,分别担任秘书、秘书助理、记帐员、仓库保管员、医生、炊事员、运输工、放牧员等,共二十七人,一九四三年增加到六十人;合作社如因工作繁忙,还临时雇用一些季节性临时工人。对以上人员都评定了工资待遇,理事、副理事月工资八十元(蒙疆币,下同),秘书六十元,一般公务员五十元,工人四十元,季节性工人根据他们实际劳动情况,

临时议定。除此，固定职工一年下来还可得到一百元的外出路费补助，年终根据工作好坏实行奖惩。这对调动公务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投资。头一年筹集的资金约有五万元，其中有100户富户的投资12,858元，寺庙投资7,460元，学校投资6,600元，衙门借款3,000元，扎萨克仁亲僧格一辆轿子车改装的中卡货车，折价7,000元作为个人投资；另外从个人和官员那里借资9,000元。当时规定，每百元投资第二年付给四十五元的利息，后来为了增加资金周转，征得衙门和投资个人同意，除了衙门借给3,000元还本以外，个人投资本息因种种原因一直没付给。

合作社成立当时设备很简陋，只有四顶蒙古包。收回来的绒毛大部分放在露天的席棚里。一九四三年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才在川井、海流图等地盖起四十间房子。从此，收购回来的绒毛不再放在露天，合作社有了自己固定的库房、铺面和办公地点。

为了和各地商号加强联系，组织货源，出

售牲畜和畜产品，在归绥、包头两地设立了两处货栈；归绥货栈由我负责，包头货栈由金钟（东贺尔扎布）负责。同年，在乌力吉图庙、沙巴嘎庙、巴音和少、阿伦胡都格、川井等地陆续建立了几处分销点。分销点的负责人有：斯琴巴图、布和那顺、塔斯阿迪亚、敖氏楚鲁、图阿乌力吉、恩和特古斯等。这些分销点的设立，对控制边商的剥削，开展合作社的购销业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合作社自筹资金在旗衙门院内办起一处手工业作坊，聘请十六名手艺人，加工毛毡和毛纺布，所需原料完全靠自己收购的绒毛。产品出厂后大部分出售给本旗官员、合作社职工和学校师生。由于产量少、价格相当，往往供不应求。有些官员和学校师生，还把我们的毛纺布做成礼服，只在节日时才舍得去穿。可见当时布匹来源之困难。后来这个厂子移交给旗衙门管辖，原料依旧由我们直接供应，不料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被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抢走毛毡二千多条。从此，这个作坊便一蹶不振，名存实

亡。

在资金和财务管理方面，我们参照了当时各地商号的管理办法，设立了资金帐、物资帐，现金帐、来往账、总帐等。帐目基本上都做到日清月结，年终清理造册总结，向入股的群众、官员公布，发挥大家对合作社财务收支情况的监督。

运输工具，有一辆汽车，还有固定的50峰运输骆驼。收购季节或大宗进货时多数是租用民间的骆驼驮运，最多曾用过400多峰。这些“沙漠之舟”为合作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合作社的业务基本是两项，就是购和销。购：就是本牧区收购牲畜、绒毛，牲畜换粮食，绒毛换日杂用品；销：就是把换回来的粮食、货物销售给当地牧民官府和学校等。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合作社兴旺发达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卖买兴隆，财源广进”。合作社的积累达到几十万元之多。

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我们从富户和牧民

手上收购的绒毛八万多斤，牛马羊2600多头（只）；从绥包两地买回来的烟酒糖茶、布匹、日用品和小百货，由于价格合理，品种繁多，花样新颖，都能很快卖出去。一买一卖，纯得利润达十万元之多。大大地激发了大家办好合作社的积极性。

这年年终，我们开了一次社员代表会，总结了合作社的工作，公布了帐目，提出了下年度的工作打算。旗王爷、协理、苏木章京、牧民代表300余人参加会议。合作社墙上贴满了标语，大家喜气洋洋，为合作社挣了那么多的钱而高兴，齐声称赞合作社的工作做得好。吃饭时还放了羊背子。会议中提出了“丰发资产，厚我资本”的经营方针。这个方针后来一直成为我们办好合作社的“座右铭”。

一九四二年，即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收购绒毛二十三万斤，还收回几千牲畜。我们打听到牲畜在北京可卖到好价钱。经蒙疆政府批准，领了许可证，去北京出售，获得了较高的利润，每只羊比在绥包多卖二元钱。一九四三年，收购绒毛二十五万斤。一九四四年，在收

毛季节前，我们对全旗可能收回的牲畜、绒毛做了全面调查，不幸，在收购前夕，日寇、国民党军、地方游杂军队经常发生战事，我们在川井的旗保安队四十多人被傅作义军队缴了械。盗贼四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业务受到很大的影响，购销工作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这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夜，傅作义驻西河三个团攻占了川井，袭击了杭盖努胡齐、沙尔邦朝格亚、乌力吉图等日寇哨所，抓走了乌盟集会长官仁亲僧格和他的家属，中公旗扎萨克斯仁东德布，合作社乌力吉图分销点布和那顺也被抓走了。乱兵抢走了这个分销点库存绵羊毛二万五千斤，驼毛三万斤，物资三万元。傅作义军队还在川井购走合作社一批物资，所付给我们国民党纸币后来成了一堆废纸。合作社的损失可谓惨重。是年不得不把物资、帐目转移到哈拉苏达拉（今川井公社桐柏队扎嘎）隐藏起来；年末又把在川井的物资转移到巴音宝日庙分销点。在那里勉强维持小范围的买卖，一直到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巴音扣庙分销点则一直维持到解放。

日寇投降、伪蒙疆政府彻底垮台以后，绥远省经济贸易处提出要与我们搞联营。旗衙门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有被吞并的危险，便婉言加以拒绝。不久，我们存放在归绥德聚泉、蒙疆公司和包头广恒西的物资以官办商业罪名被绥远省国民党政府查封。此后，合作社的处境极其困难，许多职工到包头货站闲住，一部分人回家放牧去了，临时雇用的工人被辞退回家。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双十节”那天，突然王任芝通知我（当时我正在归绥），傅作义要接见我。当时我心情很是复杂，惴惴不安，诚恐诚惶，迈着沉重的步伐到旧城公医院傅先生的住处。万万没想到傅先生一见如故，格外热情。在客厅里寒暄之后，他告诉我被查封的物资将给予启封，“完璧归赵”。还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两盟（乌、伊）十三旗会议，请你转告仁亲僧格王爷，不要害怕，只要没有血债，我们是不会为难他的。当时和我一起被接见的还有达茂旗扎萨克沙布多尔吉。我们听后非常高兴，对他的宽宏大量，再三表示感谢。

十月中旬，我们开始组织归绥、包头两地物资的回运工作。合作社当时存放在德聚祥、广恒西、蒙疆公司的物资，是用三十万斤绒毛换来的。这些物资主要有褙褙布、棉绸、烟酒糖茶、陶瓷、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仅二七砖茶一项就有600多箱，四百多峰骆驼整整运了一个月才运完。特别应当指出的仁亲僧格投资的那辆中卡汽车，作为骨干运输工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回运的物资，分别存放在乌力吉图庙、夏伯格庙、东升庙和山岱庙等处，有一部分分发到牧民手里。

一九四六年七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公旗一片混乱，兵匪一家，到处奸淫虏掠，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合作社被迫几乎关闭。因而从四六到四九年这几年中，我们除了隐蔽、处理从绥包拉回的物资，少量做些买卖，收购绒毛工作基本停了下来。其时从包头等地进来的边商很快又活跃起来。虽然他们不象过去那样获得很高利润，然而中公旗得天独厚的绒毛生意又重新为他们所壅

断。

(四)

在旧社会，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做买卖困难重重，要应付各方面的突然变故，要了解掌握市场信息，尤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要进行激烈的竞争，有时弄得你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前面提到，抗战期间，大商号不敢公开在这里大做买卖，但是大量的边商，纷至沓来，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绒毛生意依然落在他们手里。特别是日本人的大门公司和畜产品公司，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既惹不得，又躲不得，有时弄得我们频于应付，东打西挡，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搞折中、走钢丝，表面应付，背后另搞一套，是我们那时对付他们的看家“本事”。

一度，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日本商业机构、市畜产品公司，旗县货栈在绥包两地成立了一个所谓联合会，专门检查在这里出售的畜产品质量。这个所谓联合会使下边买卖人大吃苦头。畜产品运到绥包，先存放到个体贸易货

· 栈，看管人要抽百分之二的看管费，出售绒毛时为获得好价格，往往要给日本商业机构大送其礼，不然你就寸步难行。我们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时我任乌兰察布集会实物处长、警察局长、旗保安队长，身兼数职，过去做过护路保商团，常因工作需要与各商业机构接触较多，跟日本人商业部门也有些往来。所以我们运去的绒毛较少受到刁难，也能卖到好价钱。到了基层，买卖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而不在日本人手里了。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和占领国的损失甚重，为弥补其经济上严重失调的可怜局面，加紧对占领国的经济掠夺，他们的大门公司、畜产品公司，牲畜、绒毛收购季节一到，便派出许多采购人员窜来牧区搞收购，对我们的业务影响很大。我们给联系户和牧民规定，卖给他们一匹马增加六元钱附加税，剪毛季节一到，我们就从包头等地雇佣相当数量的剪毛工，分头下去，边剪边收，所以日本人商业部门收回的东西不如我们多。对边商，旗衙通过合作社职员可以高价出售票面分别三十元、

六十元的税票以加重他们的负担，限制他们的收购业务。这样，日本商业部门和边商即使能收回去一些牲畜和绒毛，不少是质量不佳、掺杂较多的次品。我们建立的六处分销点在收购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当时除了阿伦科尔沁、玛拉图吉尔两个苏木是国统区，我们在全旗的联系户达到二千多户八千余人；东公、西公两旗也有不少人和我们建立了联系。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愿意把牲畜、绒毛卖给我们而不愿卖给日本人和边商。这些联系户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民族气节，是我们能够打败对方，赢得竞争胜利的保证。

(五)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地区和平起义，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一九五〇年建立旗人民政府，绥远省政府派哈斯等同志来搞合作社的接交工作，全体职工以十分高涨的热情，积极配合工作组，清理了债权债务，收回借款，物资财产

进行登记造册，经核对、算帐，合作社的物资、财产约有二十七万元，现金二十三万元，两项相加约六十万元（合人民币），移交给了新政府。为后来建立新的供销商业，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发展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颇负盛名的经济组织，它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坎坷的。今天把民族商业怎样在动乱的年代里挣扎的事实记录下来，从一个侧面了解旧社会，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史实，不无裨益。

（乌拉特中旗政协供稿）

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

刘玉仁 吴玉山 口述

董炎炳 整理

一、绥区屯垦的历史背景及其起因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派系分争，形成各种势力。当时，绥远省归山西阎锡山管辖。阎和蒋介石有矛盾，害怕他属下的傅作义（绥远省主席），直接归顺了蒋介石，而脱离了他们的领导，即以办屯垦的名义，派亲信王靖国驻守包头，以监督傅作义的行动。另一方面，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华北和西北遭受连年大旱，军粮民食均极缺乏，唯有河套凭借“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利，获得丰收。这也是引起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对傅作义从经济上加以控制，并且能解决一部分军粮民食的困难问题，同时也能安置一些退役军人，一举数得。这就是阎锡山在绥西办屯垦的

历史背景和起因。

二、绥区屯垦的设施、人员来源及其初期安排概况

一九三二年初办河套屯垦时，总称为“绥区屯垦”。由驻包头的王靖国具体管理。在开始时先进行试点，分别从山西抽派陆军七十师、七十二师、七十三师中的三个连队和一部分军官到绥西办理屯垦试点，当时的领导机构是叫“绥西垦殖联合办事处”，处长由团级军官贾晏如担任。办事处的地址设在原来的祥太魁（就是现在的临河新华）。办事处组成后，阎锡山的旧属，为了感激上司举办屯垦和对自己的安置，就把原地名祥太魁改名叫百川堡（百川系阎锡山的字），把三个连队分布在百川堡附近开始垦殖。每连约有百余人，土地多向蒙人包种，由于土地肥沃，水利方便，所以垦殖试验一举成功。一九三二年初，阎锡山就正式下令在包头成立“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督办由阎锡山亲自兼任。由此可见，阎对绥区屯

垦的重视。由于阎本人并不能分身亲自到绥主持屯垦事宜，所以由其亲信王靖国兼任代督办。下设有具体负责人石华岩充任坐办。设总务和垦务两处，总务处长是周剑吾，垦务处长是郭维藩。总务处分管庶务、经理两科，垦务处分管农作、水利和工程科，另有一个测量队，并在五原县东郊设立农业试验场，在五原县城内设有屯垦办事处驻五办公处。除庶务和经理两个科基本上仍在包头外，其余各科、队都到五原执行挖渠、打堰、开垦种地的任务。在各级组织建立的同时，又由山西调来陆军七十师的205旅409团和七十三师的一个营共二十七个连队，连同原来驻百川堡联合办事处的三个连队总共是三十个连队，另外还有三个军官队。当时布置的阵势是205旅旅长田绣章和409团团团长侯振清均驻五原县城；410团团团长石成文驻在临河，原来先期搞试点的处长贾晏如仍在百川堡。所有统辖的各营、连队分布在西山咀（现前旗），西至杨家河以东，南到黄河，北至乌拉壕，定点开荒种地。

阎锡山依照他对绥区屯垦的目的，采取了

双层统治的领导方式，其具体分工和职责是：旅、团、营、连按原来军事系统编制负责军事指挥和军需供给、部队训练之责；绥区屯垦督办处以下各处、办组织系统负责开垦、生产和经费开支、收入、分配之责。这样一来，就直接控制了名义上属于原绥远省河套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实权，给傅作义留下的只是一个行政空架子。

三、绥区屯垦的土地、耕畜、农具来源

当时绥西河套的土地、耕畜、农具大部分掌握在外国教堂、蒙旗王公和汉人地主手中。屯垦队进套后，对外国教堂的土地，动也不敢动。唯有蒙旗和汉人地主的土地，便成了所谓“开垦”的对象。对蒙旗的土地，多以低微租金占用，对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以转租或无偿占用。绝大部分是占用大地主王同春的一些公中和牛骊的耕地、牲畜和农具。一方面王同春慑于阎锡山的势力，不敢反抗；另一方面，王同春年事已高，不愿再经营农业，安居包头，转向经营工商业。五原家中的后辈及其

亲信，各有自己的打算，纷纷起来挖其墙角，因此就勉强放弃大部分牛棚，作为绥区屯垦的基地，落得个慷慨好施，以讨好阎锡山。

绥区屯垦组成后，连队、行政、军事各级组织总共约有四千人，经营土地共60万亩，其中包括以低租包来的土地又以高租转租给农户耕种，从中增收租金。

四、绥区屯垦的沿革与消亡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华北，阎锡山为了应急，将傅作义所辖陆军三十五军及其屯垦区一部分官兵调到山西保卫太原。所留绥区屯垦官兵编成屯垦军，由徐子珍任司令，以下编成三个团，第一团团团长是于霖瑞，二团团团长是孔宪智，三团团团长是贾晏如，均仍驻守五、临和百川堡，着重练兵，土地大部出租。绥、包被日军侵占后，原在包头的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迁至五原和原在五原的办公处并在一起。这时原绥远省的机关及地方团队，也都退到河套。还有宁夏马家的军队作为保卫宁夏的前哨，相机

推进到河套。蒋介石原在河套派驻有骑兵第七师，在抗日前线统一指挥的名义下，军事上统一归军长门炳岳节制，这时绥区的屯垦已成为次要矛盾，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一九三九年春，傅作义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回到绥西河套，并恢复原绥远省主席职务，即在陕坝组成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并健全了原绥远省政府机构。所有当地国民党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在傅作义一人统一领导之下。这时的傅作义便完全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归蒋介石的统辖，即将原来的屯垦军改编成五、临警备旅，把原来阎的兵力为己所用。一九四〇年初，日寇侵入河套时，傅作义为了保卫河套抗日基地，将五、临警备旅集中起来参加绥西战役，同时把屯垦办事处从五原移至百川堡，这时所谓以前的绥区屯垦督办处、办公处等组织机构均不复存在。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间，我军在收复五原战役中，五、临警备旅团长贾晏如阵亡，为了纪念五原战役阵亡将士，把五原东街命名叫晏如路。在五原战役后，傅作义又将

五、临警备旅，改编成为203旅，由原来地方部队性质改属第八战区的正规部队，这是傅作义将原来阎锡山的屯垦军据为己有的又一措施。但阎锡山对屯垦军的遥控并未忘怀。还想卷土重来，在得悉傅对屯垦军的改编后，即于一九四一年，又从山西派来田树梅到百川堡屯垦办事处任坐办，然而这时的屯垦军精锐已经抽调改编成正规部队，所剩者，只有少数老、弱、残兵和退役军官及勤杂人员。田树梅即在百川堡把原来的屯垦军旧底子改编成三十个垦队，每队仅设队长一人，上士一人，垦兵不过十来人，土地多已出租，自种很少，生产和收的租金除维持办事处职员和队长、垦兵生活经费外，其余多为有权力的官长贪占，这是原先留在地方上的营、连、队长，后来多变成富农和地主的原因。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和傅作义对屯垦队无暇顾及，因此，屯垦队就安然过起了地主式的生活。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将原先在百川堡的屯垦办事处，迁回五原改为绥西军垦试办生产指导办公处。在五——一五二

年期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将所有办公处职员和各队长调往集宁学习，另行安置，各队士兵遣散就地安置，从此屯垦队宣告结束。

总观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十九年，实为阎对傅作义的控制和傅的反控制的斗争，也是阎、傅和蒋介石之间明争暗斗的一个插曲。但客观上也对开发河套起了一些作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做了一些贡献。随着蒋家王朝的灭亡，山西、绥远的解放，这个军伐斗争的工具，压迫剥削人民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前进，必然消亡。

旧社会河套的“独立队” 和“哥老会”之概述

刘培荣

河套地区的哥老会，源于四川省，系“袍哥会”之支流，据说最早成立于清朝同治年间。在同治八年，湘军征服金鸡堡后，返回包头驻扎三年。湘军中的哥老会组织，便在包头扎下了根。以秘密活动的方式，逐渐向包头以西地区伸展。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这一组织日渐公开，发展蔓延到后套一带，并且被地方豪强、地痞恶棍所控制，成为欺凌压迫人民的工具。当时群众说：“紧躲慢躲惹下了老哥（哥老会）”，从这句话里，足可证实当时的哥老会是如何的跋扈猖狂。哥老会原是“反清复民”的秘密结社，后又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招牌。哥老会在江南叫“帮”，在四川叫“堂”，在河套叫“排”，名虽不同，实际是一回事。它通过结盟拜把子，以一定的会规相互

约束，在行动上标榜侠义，生死不渝，在会内有权力威望者，名之为大爷，亦就是“龙头”，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势。

后套“独立队”的兴起，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间。阎锡山所属孔庚部队中的一部分人哗变。到处成立了“独立队”（一种土匪组织别称），来到河套以后，“独立队”的声势更加扩大了，成群结伙的“土匪”和“哥老会”连成一气，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从山西杀虎口到甘肃吴忠堡（今宁夏区内），整个长城内外，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里，到处插满了“独立队”的旗号。他们纵横于晋、陕、绥、甘四省。尤其在外蒙独立后，匪首卢占魁被赶回内蒙，纠集了几百人马窜到后套，所需粮草全是王同春的牛骒给支应，卢占魁的“独立队”窜到陕北陇东一带，和那里的哥老会挂上了勾，卢占魁既是“哥老会”的“龙头”，又是独立队首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率部横跨黄河，纵走东西，明伙执仗烧杀抢掠，为害尤甚。

光绪年间，清政府废除了妇女出关的禁令，

允许垦殖走边，因而从满清末叶，到民国初年，遂使风沙弥漫，荒草遍野的河套移民人口日增，随之而来的商业亦逐渐铺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情况异常复杂，盗贼匪徒猖獗，社会上一片混乱，地方很不安定。其时，西至后套的五原、临河，南到伊盟的东胜一带，都属萨拉齐厅管辖的范围。鞭长莫及，老百姓有了争端或人命案件，若要诉讼告状，就得千里迢迢，步行到萨拉齐去解决。那时的五、临地区，既未设置行政衙门，又无维持社会治安的机关，以致满目荒凉，一望无际的后套，连年处于兵慌马乱，鸡犬不宁的境地，土匪蜂起抢劫，哥老会结帮横行，老百姓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民国初年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在河套地区先后流窜的著名的土匪头目有卢占魁、赵有禄（外号半吊子）、苏生雨、小白狼、八音豹、张老五、马大头、大辨四、黑脸王、张宝山（又叫小金子）、张风山、刘三红、马虎成和王英手下的班头如袁占鳌、周鸿滨、苏子诚、杜子玉、杨猴小、康存良等

等。他们为非作歹，老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朝夕之间，就被抢的一贫如洗，日夜提心吊胆，不得安生。那时虽然有点地方部队，但实际与匪互通声气，在剿匪的幌子下，乘机混水摸鱼。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掠，人们恨之入骨，称之为“二茬独立队”（也就是“官土匪”的意思）。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陕北榆林地区的哥老会“龙头”高石秀，着郝孝周（崇文）到五、临给王同春帮闲（王本人亦是哥老会的头目）。由郝孝周出谋，王同春策划了一场蒙汉村民争夺土地的纠纷。这个大地主王同春（原籍河北省顺德府人）乘机实行武力调解。从而强占或以低价收购了大量土地。郝孝周也得到王同春的赏识，推荐他加入了哥老会威字辈（最高一辈），王同春为把“哥老会”打入卢占魁的独立队，以密切“哥老会”和“独立队”的关系，又将郝孝周介绍给卢占魁，以当师爷的名义，在卢占魁的独立队内发展哥老会组织。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郝孝周从卢占魁的匪兵里，拉了十几个哥老会员，回到王同

春在达旗的牛犊东大社堡子。以此作为哥老会据点，在东大社设山头，开香堂，逐步扩大哥老会成员。对不入会的农牧民，称为“白头牛”，备受他们的暗算，尤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间，哥老会遍布后套，到处设香堂开山，无恶不做，手段毒辣，用“请财神”，“拉票子”种种刑罚残害人民，如：把铁锹烧红让人坐上，名曰“坐火车”；把人绑在长条凳上，头朝下往鼻子里灌辣水，名曰“喝代酒”；把铁丝烧红插到耳朵里，名曰“打电话”；还用开水浇人的七窍等。当时后套人民出于对这帮匪徒的义愤，唱出一首民谣：“阳婆婆一落是黄昏，家家户户紧闭门，捆住男人刁女人，银钱刁个净打净，赵半吊子把人刁，迟早你也活不了。”

从此，王同春牛犊东大社堡子就成了后套哥老会的策源地。王同春在后套的世业，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成为独一无二的绥西霸天，形成地区性的封建势力，与哥老会的维护是分不开的。当然，王同春在开发河套水利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是无可讳言的历史事实，王

同春一生开渠十三道，灌溉面积广至五原、临河等地。因他一眼失明，人们叫他“独眼龙。”后套人传说的“一龙治水，五谷丰登”，就是指王同春而言。正因为他在河套水利上有一定功绩，所以当他于一九二五年逝世后，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特在包头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在五原旧城东北的一块空地上，给他建了一座祠堂，责成专人看管，每逢周年时，搭台唱戏三天，官方还派警察维持秩序。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每当独立队围攻五原县城时，不少豪绅巨富，大都跑到祠堂里躲身避难。因为所有的土匪独立队，好似有一条戒律，都不到王同春的祠堂去扰害，这也与王同春在哥老会内的威望有关。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包头地区哥老会“龙头”杨万祯率数百名土匪，围攻包头城。郝孝周亦带着几十个哥老会成员与之配合，但被城防司令马鸿逵部队所击退。

一九二三年杨万祯和王英接受了绥远都统马福祥的收编，王英任骑兵营长，后升为团

长。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王英被西北边防会办张树声委为“绥远革命协会”委员长时，郝孝周在王英手下任副职，他在部队里主要工作就是代替王英掌握哥老会组织。及至王英部队逐步扩充到师的时候，团长以上军官全是王英统辖下的哥老会小首领。团部设“马头”，由大哥、三哥、五哥负责一切会务和军务，连长以上军官百分之八十是哥老会员，如旅长袁占鳌，团长杨五在、张忠元、李风山，特务营长史文华，连长杨猴小（官名杨辉峰）、陈秉义、李崇山等，均系哥老会成员。

一九三七年，在王英当了汉奸的时候，被日寇特务机关委以“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暨“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郝孝周担任助手。哥老会在伪军中成为骨干力量，起到很大的助纣为虐的作用。王英这个土军阀，是由恶霸地主发展起来的。他领兵为匪四十余年，主要凭恃的就是哥老会势力。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被北洋政府委为西北边防督办，管辖察、绥、陕、甘、宁等省区。冯的部将

张之江坐镇张家口，任察哈尔都统。刘玉芬坐镇西安，李鸣钟任绥远都统，韩复榘镇守归绥。石友三镇守包头。孙良诚镇守萨拉齐。冯玉祥的督办公署设在包头。因为冯玉祥的势力转到西北，故将冯部军队称为西北军。当时的后套只有一个五原县。临河尚未设治，安北（大余太）是五原县属的一个区。在冯玉祥部队进驻包头前，哥老会已遍及绥西地区。小五杨是“老龙头”，哥老会和独立队两位一体，狼狈为奸，不少土匪头子如五原的“大龙头”，都和哥老会有组织关系，如包头的“大龙头”肖吉元、李三河、梁宇庭、顾焕章以及张洪等，副龙头李玉成、刘旭初这些哥老会“龙头”无不与“独立队”结成一体，扰害地方。民国十四年，宁青军统领马子乾进驻五原隆兴长剿匪时，拿获了梁宇庭就地正法，民国十五年冯玉祥部将石友三又逮捕了匪首小五杨（即杨万祯）也予以枪决。从此哥老会声势衰败，但在地方上潜伏下来的势力，仍可左右其会众。

再如王同春及其子女王英、王爱昭（二老财）等，也皆是哥老会的首领。在王同春的子女

中，王英排行老三，人们称他三财主。起了个外号叫“三没底”。王英的姐姐二老财（就是王爱昭）青年寡居，虽系女流之辈，但有相当本领，尤其善于社交，能说会道，比之王英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生了四胎，成活两男一女，男的叫张树清（二毛）张树德（三毛），女儿叫张树梅。做人处事，也非常练达人情。

王英这个土军阀，独立队的总代表，一生荒唐，做事无能，全凭他二姐王爱昭来主宰和左右一切。以至哥老会的“老龙头”小五杨（即杨万祯）借哥老会的声势，被绥远都统马福祥视为上宾，聘请他当了都统府参议，于此可见哥老会之不一般。

在冯玉祥督办座阵包头时，所属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外号石正纲、石阎王）秉承冯玉祥指示，“擒贼先擒王”，首先把哥老会头目小五杨（杨万祯）逮捕枪杀，接着把“大龙头”肖吉元、张洪亦执行砍头，将脑袋挂在电线杆上示众。另一些“大龙头”李三河、顾焕章、梁宇庭在五原枪毙。哥老会这些主要头目被杀后，接着一些小头目也纷纷报案自首，分别给以了

应得之惩罚。这样一来，对河套地区的震动很大。哥老会转入地下，一度销声匿迹，不敢再公然盛气凌人，扰害良民百姓了。

冯玉祥对土匪更加严厉，除了饬令所部对流窜的股匪大力围剿，坚决镇压外，还采取招抚的办法收抚了大大小小的独立队匪帮。如张宝山（即小全子）、张风山、王肯堂、满泰和张万庆等股匪。后来这些匪部都成了冯玉祥的部下。这些人曾随西北军打过雁门关。其中也有些人后来哗变了。冯部在剿匪的同时，对哥老会亦加强了相应的取缔措施，遂使包头、五原以至整个河套地区，出现了社会秩序较为安定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九月，冯玉祥从苏联回来后，九月十七日在五原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委王英为绥西护路司令，后来，护路军成了断路队，打劫行人。王英乘机又用他收藏的武器和蓄养的马匹，武装了他的地户（佃农），编为正式军队，在河套的包、五、临线上，成了一支不可轻视的实力。这可说是王英地主土军

阔的起源。进而成了他为匪作恶的本钱。正如王同春临终时，训骂王英说：“老子给你挣下了个三财主，你给老子挣下个老贼头。”诚然如此。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部拟经兰州东出潼关进行北伐。然而在西撤路上，从包头、五原、临河、磴口至宁夏一千六百多里的旅途，均为哥老会的势力所控制，而先头部队，竟被沿途武装的哥老会（打着独立队旗号）给解决了一小部分，在此情况下，迫使冯玉祥采取了和哥老会妥协的办法。一改过去对哥老会的镇压政策，而出示布告，誉哥老会为“革命协会”，承认其合法地位，同时电请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张树声，从张家口动身来包，因张树声和当时绥西地区的山主马福元交情深厚，同为山主的缘故，张树声亲自到五原拜见了马福元，经过一番交涉，马福元答应按照哥老会的山规，要求冯玉祥亲自到五原拜山。冯玉祥将军无可奈何，在张树声的引进下，来到五原拜了山，香堂设在五原商会院内，仪式系在夜间举行，布置极为森严，礼毕，冯玉祥在取得哥老会的关照

下，始令其部队按预定路线，迅速开拔前进。

迨冯部军队离开河套后，独立队和哥老会等匪帮又日益活动起来，直到一九二九年冬阎锡山收编王英部，强令缴枪。王英在形势逼迫下，成了光杆司令，挂了一个参议空衔，到天津日租界隐居。王部缴了枪以后，杨猴小、史文华拉了些人马离开，并纠集散在各地的匪徒，又搞起土匪独立队活动，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傅作义担任绥远省主席，曾令老一团黑马队进套剿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担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接着指派王靖国所属的田树梅二〇四旅，田绣章的二〇五旅开进河套剿匪，哥老会亦在取缔之列，所谓拜山主，设香堂都受到严厉查办。那时危害河套地区的土匪，只剩下杨猴小所领的千余骑匪，虽经东拦西击，跟踪追歼，也没有根绝了匪患，仍然此起彼伏，出没无常。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屯垦军的入套。没收了王英牛犊的土地，又加以屯垦队星罗棋布，新村林立，对土匪的流窜才给以极大的抑制和打击。但是，匪患虽然削弱

了一些，但并没有斩草除根，依然时隐时现，拦路打劫，及至一九三三年孙殿英四十一军过境，收罗了杨猴小匪部，西去攻打宁夏，匪患方告平静。

(临河县政协供稿)

哥老会及其暗语

王致忠、王天林、张彦彪 口述

樊登高 整理

一、哥老会的山、水、名、堂简要含意

“山”是指你是那个山头的人，“水”是指的吃什么水，是指清水还是混水。纯粹不加入哥老会的人，暗语叫“白头牛”。会内共分三个堂，第一是“三元堂”，第二是“四喜堂”，第三是“五福堂”。这几个堂是哥老会内辈数的排列。如三元堂是分的东排或是西排，暗语又说“你是占东还是占西”，人称“你是东号上的还是西号上的”。会内共分卫、德、福、喜、财五个字。占“卫”字的是爷爷，占“德”字的是儿子，占“福”字的是孙子，占“喜”字的是重孙，占“财”字的是曾孙，如有许多会员在一起都依这个辈数作为称呼语用，会员和会员双方识别

是自己人还是外人，完全根据暗语为标准。如会员们走到陌生的地方使用暗语，如果对答如流，那就认为是自己人。还有的暗语叫“空子”和“溜子”，含意就是这个人行动可疑，另一个是认为这个人行为不够正派。“五福堂”是排行老大，在会内是发展会员的，老五是管事人，又称“红旗管事老五”。会内最大的统治者就是“龙头”，又叫山主，龙头是上层主要负责人，老二是当家的，老六是管辖福祿的。即管事业救济及经济等事宜。老九是辖江口的，他的任务是在砍香时，传受会内日后双方识别的私行暗语。根据哥老会的辈数来说，会内共有成员弟兄十一人，老十和老十一是会内的两个小弟弟，不负会内章则及别的任务，老十一按哥老会的章程内规定叫“一点”。收了会员按区域，按片指明那些会员受谁领导，及受那些人的栽培。

二、哥老会“四梁四柱”的要义

所谓四梁四柱就是说一个人入哥老会是谁的引进、介绍的，由谁栽培，受谁领导。四梁

四柱的含意是根据小说《水浒》传梁山一百单八将作为根据起源的，如会内暗语说：每条木梁有多么长？对方能够答上：每条木梁九尺长，四根柱子有多么粗？对方能够答上：每根柱子一丈八尺粗。如四根柱子，四得四、四八三十二，是七十二；四条梁每条九尺长，四九三十六，七十二和三十六加起来算是一百零八。

三、哥老会接收会员

入会的名叫“砍香”，吸收的新会员入会时，三至五人不等，在这个会场内，要有新旧会员同时参加，这个吸收新会员的香堂，多数是设在红旗老五的家内，参加人数多至二十人，少至十五人不等。时间都是在晚上的十二点钟以后才举行，举行的状况（一）辖江口的老九宣布开会程序。（二）红旗管事老五主持开会并且说明吸收新会员的情况。（三）栽培人介绍新吸收会员的姓名及个人条件，然后把点燃着的黄香三柱半横放到案板上，让新入会的会员手持一把菜刀砍香，这时新旧会员结合在

一起，严肃瞩目，新会员砍断了三柱半香时，认为是真心实意，可以接纳，否则还有训诫责罪，在该会兴盛时期，砍不断黄香还有杀头的危险，入会砍香时无论新旧会员，每人付钱两元，砍香后互相大吃一顿散会。新吸收的会员在砍香前要对天盟誓：①有马同骑，有官同坐，有钱同花，有衣同穿。②上有垒天，下有后土。③我本人入了哥老会之后，遵守会章制度，听从上级栽培人的指教，入会后如有三心二意，不得好死，什么为证，三根半黄香为证，砍不断黄香人头落地。

四、哥老会进行联络的部分暗语、暗号

（一）阻止对方不愿和他多谈话时就说：“小铜烟袋上三条龙，先生不要打听我的名和姓，要想知我的详细情，普陀山上有我的名”。（二）夜间一进院内先打咳嗽声，家里的人就答了：“家里有人吃清水，不用问也是自里的人。”平时一进门先将自己的帽子，帽口向上扶，进门后到了地下，将自己的脚站成丁字形，上了炕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帽口

向上帽顶向下，放在炕上。如此举动，家里人就认为是自己人，这样就问他：“你是占东还是占西？”如果能够答上来，这样认他是东号上的还是西号上的，到了晚上出去抢掠时，一进院内就问：“有占没占？”如能答上来时，那就安然无事的去了，假使是不入会的白头牛答不上来时，立刻抢掠一光。还有一种暗语是夜间出去抢人时，一进院就问：“有马没马？”如能答上“有马”，“什么马”？“黄膘马”，这就是自己人的暗语。（三）夜间私下双方准备去谁家抢人时的黑话：“去高家是探不上，郝家是看不见，白家是不用洗，曹家是洗不净等等。”（四）清水和混水之区别，入了哥老会的叫吃清水，另一种暗语是，虽然入了哥老会是会内的成员，可是不同他们混在一起出去抢掠民财，而是安分守己的善良人，这种人叫做吃混水，是会内的派外分子，是监视的对象，不入会的白头牛，是随时受欺侮的人。（五）哥老会的吃饭、喝茶、吸烟，暗语叫“捆条子”，饭叫“食条子”，烟叫“火条子”，茶叫“木条子”等等。

五、痛斥小五杨 赞颂石政纲

哥老会头子小五杨，为匪作歹，欺压人民恶贯满盈，广大群众恨之入骨，编了一首顺口溜，痛斥小五杨：

小五杨萨县人，黑心鬼害黎民。
包头有了小五杨，买卖成了黑市场。
白天大街无人去，夜间各巷有盗抢。
大小商号将门闭，萧条冷落好伤惨。
大种鸦片公湖洞。私养家兵几十名。
黄草洼的二里半，洋烟地种到大榆树滩。
淫欲成性的小五杨，数十个女人轮私房。
强横霸道的小五杨，家里私设洋烟枪。
姑娘打烟媳妇问，烟门子就叫刘国栋。
小五杨与儿子办喜事，借口勒索要分子。
分子抖到河套区，每人送钱收玩器。

宴席大摆三月还挂零，袁大头赚下五万整。
驻防包头的国民军司令石友三（又名石政纲），曾对哥老会进行了清剿，受到人民的称赞，也有一首打油诗如下：

驻守包头石司令，实施清乡纪律明。
石友三真英勇，伸张正气为人民。
清乡队伍是为谁？彻底铲除哥老会。
一顿不饱十顿饥，根源在那哥老会。
不入哥老会的“白头牛”，大人孩子日夜
愁。

公正善良的“白头牛”，仔细思量没活头。
县乡到了清乡队，专门清查哥老会。
自行投案赦无罪，隐匿潜逃罪加罪。
抢掠民财不久长，杀了哥老会头子小五
杨。

自从杀了小五杨，农民商人享安康。
快乐日子谁带来，回想还是石政纲。

（临河县政协供稿）

陝垣明妓院及暗娼簡介

高炳炎

大楊樹院西沙壕，這是解放前陝垣的兩件“寶”。所謂“寶”，並不是這兒有什麼名勝古迹值得留戀；也不是有什麼美麗景色吸引人們嚮往，而是這裡有一些面帶“笑容”的姑娘，向過往行人招展，她們就是陝垣妓院的妓女。

解放前陝垣的妓女大致分為三類，即：明窰子、暗門子和野妓。

明窰子就是妓院，也叫平康里。早在一九三四年賈洪元買了兩三個妓女，在三義棧巷已經開了個小妓院。老婆當老板（妓院負責人），自己當“大茶壺”（妓院提水人）。以後又逐漸發展，集中在兩個地方——三義棧巷和楊樹院。在三義棧巷內，分了個大南院和小北院，在大楊樹院分了個楊樹院、小南院和小西院。兩處五個院子，共有單間房四十間左右，妓女三

十余人。

这些妓女，有些是被人贩子贩来的小姑娘；有的是被骗子手哄来的难民；还有的则是因家中负债太多无法偿还，只好叫自己的妻子、女儿去卖娼。当时南大院的“胡椒辣汤”（因丈夫是个卖辣汤的而得名），便是因丈夫无法还债，而将自己的妻子定期出租给妓院的。

每天下午在大杨树院和三义栈巷，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媳妇，“笑容满面”地在等待着来寻欢作乐的客人。

这些姑娘、媳妇，有没有欢乐和痛苦？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一九四七年秋的某日，我以陕坝《奋斗日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了一次杨树院的名妓“福喜”。我用与她谈心的方式让她先谈一下自己的身世，再谈谈她的感受。

她说：她是河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父母逃难出来。不料，在逃难中与父母失散，她被骗子手以帮她找父母为名，哄到陕坝被卖在妓院。当时她才只有十二岁。

二年后，她刚到了十四岁，老板便逼她

“接客”。因为她不同意，晚上便被老板打得死去活来。一个远离家乡的难民，无亲无近，最后逼得实在没法，只好违心同意。她说：每天从下午两时开始，到晚上十二点落灯，要招待二、三十个客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小伙子，也有五、六十岁的老翁；有性情善良的“好人”，也有脾气粗暴的恶棍。有时三、五个混来一群（端盘一数不限），各种下流动作应有尽有。如稍一招待不周，不是摔盘打碗，就是拳打脚踢，晚上还得挨老板一顿棍棒。为了不挨打受气，不管见了什么人一律笑脸相迎，想吻就吻，想搂就搂，想揣就揣，从肉体到心灵已经被蹂躏的麻木不仁了。表面上看去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实际上我们这儿没有欢乐，只有悲伤，只不过我们的眼泪暗暗流在肚里罢了。

最后她说：这个鬼地方，是供下等人发泄兽欲的场所，我们是给老板挣钱的工具，所以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

“暗门子”，“野妓”，都是暗妓。这些人不是丈夫没有固定职业或不

务正业，耍钱或吸鸦片，就是丈夫当了兵，家中无人依养，逼得卖娼。这些人主要以中山堂对面的巷子和西沙壕为最多，因此“大杨树、西沙壕”，当年便被人称为陕坝的“宝”。

一九五一年，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清理，取消了妓院，这些饱经凌辱，受尽了人间辛酸的“妓女”，才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一个个怀着喜悦的心情，“存良”嫁人，开始了她们新的生活。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旧社会的“禁烟”“禁毒”

王思荫

旧社会的“禁烟”、“禁毒”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冠冕堂皇的所谓“要政”，其实，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所谓“烟”是指鸦片而言，也叫大烟。所谓“毒”是指“海洛因”、“吗啡”等而言。鸦片本是一种药名，《本草纲目》称为“阿芙蓉”亦名“阿片”。鸦片是从罂粟果实上割取下来的浆汁，晒干即成鸦片。罂粟是一种植物，叶为长椭圆形，有锯齿，花大而美艳，有红、白、紫等色，雌蕊状如瓶，实为干果，果实未熟时，中有乳白色浆汁，为制鸦片的原料，晒干成褐色的块，有异臭，内含吗啡等质，毒性很大，为定痛安眠的药品。海洛因或译安洛因（俗称料面、白面），为白色结晶性的粉末，味稍苦，有麻醉性，能镇静呼吸器官，减轻咳嗽的刺激。吗啡是植物硷类中的重要物品，用

鴉片蒸發制成微細的根狀結晶，味苦，入水難溶，與鹽酸或硫酸化合，為止痛催眠的要品，性有毒。

鴉片產於印度，一百多年前，英國資本主義向外發展，積極找尋市場，以印度為遠東基地，英國的商人逐漸來到我國廣東一帶，進行貿易，輸入鴉片，以後逐年增加。不僅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而且毒害了無數的中國人民。當時少數愛國官吏如林則徐等就深刻地指出烟毒的害處，於是滿清政府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派兩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負責杜絕鴉片的輸入。林則徐在廣州迫令英商交出鴉片二萬餘箱，全數焚毀。這一偉大行動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堅決性。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清廷和歷屆反動政府的軟弱無能，雖然口頭上提倡什麼“禁烟”，但實際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結果造成了禁者自禁，種者自種，運者自運，售者自售，吸者自吸的局面。所謂“禁令”，不過是一紙空文。當時的中國已是民窮財盡，各省的經費多靠自籌，而自籌的辦法又以

征收禁烟罚款为主要来源。这样，各省上自省府，下至县区地方，名为禁烟，实则是扩大种、运、售、吸，每年春播前，各地方照例张贴禁烟布告，掩人耳目，其实人民早已识透反动政府的伪善面孔，就大种特种，大卖特卖，大运特运，大售特售，大吸特吸。结果是良田沃土，几乎全是烟亩，吸烟的人，愈来愈多。这样一来，反动政府就要征收罚款，美其名曰“寓禁”、“予征”，按烟亩征收罚款，向烟馆征收捐税，每亩罚款十数元至数十元不等，每家烟馆，按月收捐百八十元，当时从省级到保甲人员，凡沾手者都是大发横财，肠肥肚饱。至于县长更有法定的百分之五的提成，名为办公费。

可能有人要问，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有违反禁令而犯罪的人呢？答复是：确有其事。那时候的反动政府也有一套反动哲学，说什么“惩一儆百”。换一句话说，就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有钱有势的人，即使是公开的、大量的种、运、售、吸，也犯不了什么罪，而无钱无势的群众，虽是小量的、偷偷摸摸的，确

实有很多人挨了枪毙，蹲了监牢。

下面再谈一些琐闻。

种烟是在春融冻解的时候下种，待出苗以后，进行耕锄，成苗后灌水两三次，等到六、七月间烟苗开花，再过一个时期，烟苗的果实半成熟，用小刀轻轻割破外皮，乳白色的浆汁流出来（很象蒲公英的浆汁），再用手指把浆汁抿收起来，晒干即成褐色鸦片膏。待吸食时再用水溶化、熬煮过滤，熬成粥状，即成熟膏，然后才能吸食。

禁烟罚款是按地亩计征，所以在征收罚款以前，先要进行丈量，名为丈烟苗，以县为单位，由伪县政府派大批人员，分成若干组，到烟地逐块丈量，谁花贿赂谁占便宜，谁胆小忠实谁吃亏。所以每年丈烟苗的时候，种烟的人要尽情地递上好的烟茶、酒肉招待丈烟人员，同时还得暗行贿赂。种烟之前，由伪省政府向各县派定罚款数字，多种摊得轻，少种摊得重，实行大包干。所以各县在种烟之前，要进行宣传扩大烟亩数。在丈烟的时候，由各县预制烟亩丈量单据，丈完一户，发给一张，凭此交纳罚

款。这方面的营私舞弊是层出不穷的。当时有一个县，县长串通省派禁烟委员，把交回的单据存根隐瞒了好几本，结果这一部分罚款，就由县长和省派禁烟委员私分。

关于禁运也是骗人的。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等运烟，有时以火车、汽车、大车成车运输，由甲地贩运到乙地，毒害人民，有军警护送，没有人敢于过问，成了公开的秘密。此外，有的人挖空心思，想出许多蒙混办法，以逃避关卡的检查。如有的用棺材装死人，在人尸体内存或挖空棺材板壁偷运鸦片，有的挖空活羊的尾巴，把鸦片缝裹进去，以赶羊为掩护，偷运大烟。有的人把烟毒包扎成圆柱形塞入自己肛门里，往来贩运，人们叫他肛门队。其它如衣服行李用具中的暗藏夹带，更是屡见不鲜。

所谓“禁售”，也是表面文章，用以欺骗人民。当时山西省的阎锡山就公开出售戒烟药饼，实则戒烟是幌子，而药饼就是大烟，等于官卖官吸。再以旧绥远省而言，市面上烟馆林立，招牌上写得是“清水净烟”，门旁贴着大红对联，歌颂吸烟的好处，招揽人们进去吸食。

关于吸烟的鬼名堂，更是无奇不有。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吸烟非常讲究，烟膏讲究地道，烟具极其豪华，“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兰烟灯”，“恰因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烟签尖棱棱”、“媳妇打烟，姑娘侍应，跑跑趑趑是二不流子后生”，“饭罢一袋烟，顶如上西天”。烟具中以烟袋杆（亦称大烟枪的）讲究最多，有的是玉的，有的是用甘草挖空的，有的是竹木的，上面用金、银或铜质镶焊。镂刻精美。烟枪而外，烟斗也是主要部件，以宜兴陶器“允鸣氏”斗为最好。吸烟的人们，或二人对卧，或三人成三角形，或四人成正方形，围灯横卧，室内烟雾缭绕，废时失业，社会道德败坏。

大烟除用烟具吸食之外，后来又出现了许多简易吸食方法，如有的用竹筒或小纸卷一个，含在嘴里，或把大烟用烧红的铁条煨烫，吸烟者把烟气吸入嘴里过瘾，这叫做烫大烟。吸食海洛因大体和烫大烟相似，是把海洛因撒在一块锡纸上，下面用火柴烧燎，再张口把烟气吸入，这叫做“吃料面”或叫做“坐飞机”，成瘾更速。至于穷人吸烟就更简单了，

“七茬八茬尽管抽，九茬烟灰不进斗， 抠到手， 扔到口， 管它进斗不进斗。”

大烟不仅使吸食者废时失业， 倾家荡产， 而且在旧社会往往有吞服大烟而自杀的人， 为害之烈， 笔难尽书。

当时反动政府的禁令既如上述， 因此，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之前， 全国的良田沃土， 尽成烟亩， 而人民群众中的烟鬼随处都有， 民生所需的面粉、 大米和棉花等等反仰于帝国主义。民穷财尽， 遍地饥荒， 其中大发横财者， 只有军阀、 官仔、 地主、 资产阶级而已。据可靠消息， 在抗日战争时期， 沦入敌区的归绥市， 日本特务清查户口， 到了一户人家， 一开门看到满屋烟雾， 这家人全是烟容满面， 状如鬼怪， 这个特务高兴地说：“好的、 好的。” 结果并没有查问户口情况而去。可见日本侵略军对这样的人家才真正放心哩。

另外， 烟毒的害处， 不仅毒害了人民群众， 甚至连周围的小动物也染上烟瘾。有一户人家， 屋顶有鼠洞， 老鼠闻烟成瘾， 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就把老鼠瘾死掉了下来。另外有一家

养着一只百灵鸟，当每晚上主人开灯吸烟，烟气满屋之后，百灵鸟才鸣叫起来，如果主人没有烟吸，百灵鸟就病了。至于吸烟能够消磨人的意志，败坏社会道德，更是必然的结果。有些没烟抽的人，常常出去“打秋风”抽带烟，有时把慷慨的烟主人捧到天上，希望人家赏赐一口，有时把吝啬的烟主人描绘的不成人样。如巴结慷慨的烟主人说：“一进门，喜气生，炕上躺的个吕洞宾，虽然不是真神仙，脸前摆得大明灯。”又如讽刺吝啬的烟主人说：“二进门，怒气升，炕上躺着个活死人，虽然没有进棺材，脸前摆得照死灯。眼流泪，口吐痰，屁股里流些淘米泔。灯瓜瓜，纸罩罩，炕上躺的个死耗耗”。（老鼠）。

人们染上烟瘾之后，什么奇闻怪事，都会出现，有的人吸烟，横躺吸几口，再翻身竖躺吸几口，才能过瘾，有的人边吸烟边喝茶，叫做“水推云”。吸烟的人好吃干的要喝些水，好睡宽处要卷起腿，甚至有这么一个人，吸几口烟就在床上翻几个“跟头”，翻完再吸，吸完再翻，这样才能过瘾，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说：“当他小孩的时候，父亲非常溺爱他，让他吸烟，吸完烟又让他翻几个“跟头”，取乐开心。因此，到了长大成人，就惯成了这样的毛病。

又有一个人因吸烟卖尽财产，后来又把妻子也卖掉，剩下两个小儿女，孤苦无依，孩子们常常坐在烟灯前想念妈妈，问他妈妈哪里去了？这个人指着烟斗的小孔说，你妈妈进到这里去了，过几天你们就能进去见面，孩子们不解其意，认真地向小孔直瞅，以为真能够看到妈妈，而不知其父还打算把他们也要卖掉哩。

还有这么一个人，烟瘾很大，养活不了妻子，让妻子公开与别人姘居，他的妻子与姘夫在前炕睡觉，他自己在后炕吸烟，过瘾之后，还自言自语的说，人是各有所好，你们爱好那个（指妻子与姘夫睡觉）；我就爱好这个（指吸大烟）。

以上仅就回忆所及，拉杂写了一大片，其实也是挂一漏万，现在写四句话做个结束吧：

回忆烟毒害，不禁长唏嘘，拉杂做叙述，聊当控诉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9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